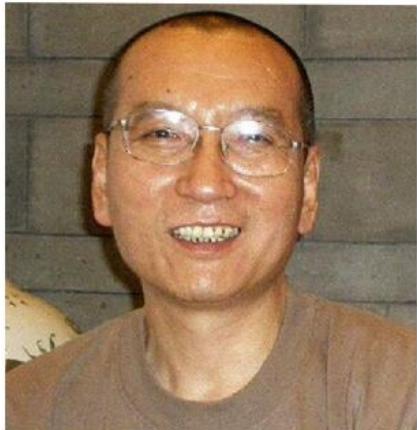


休戚・能否・與共



李敖——

研究資料集刊12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總序

一陣旋風經過，只留下驚愕者在凌亂中摸索與重建。

李敖先生辭世後的這些年，對於他的讀者、聽眾、學生乃至信徒而言，無疑是充滿遺憾和惋惜的。李敖先生還有太多想做的事沒有做，還有太多要寫的書沒有寫，不管是對作者還是讀者而言，這都是難以釋懷的。我們固然不能替李敖續寫這些偉大驚人的篇章，但我們也沒有停下傳遞李敖精神的脚步，從李敖網站、李敖研究論壇到大李敖全集，一批批李敖研究者不斷努力，從一個個文字、一張張圖片、一則則新聞，到一段段評論、一篇篇文章、一本本專書，李敖研究者就這樣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李敖精神，我們堅信，李敖的精神與思想將以這種形式永遠存在下去。

自互聯網興起的幾十年來，兩岸的李敖研究者為我們留下來珍貴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形式上雖不同於專業學者著作，但在內容上卻遠勝許多所謂學者剪刀漿糊之作。然而隨著網站的查封，人員的流散，很多資料丟失了。而由於消息的閉鎖，許多與李敖相關的文章和報導也散落在互聯網的各個角落，不為李敖研究者所易見。有鑑於此，我們決定發行《李敖研究資料集刊》，內容採集範圍涵蓋

名家文章、讀者作品、媒體報導，謹將其中有助於李敖研究的文章和資料揀選成輯，定期推出，既不捐前賢之功，又可廣後來之聞。其中的一些資料，或許會在將來單獨結集發行。同時，也希望讀者可以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多的成績，如有佳作，歡迎隨時投稿。另如涉及版權問題，請及時通知。

最後，僅以此集刊獻給九十歲的李敖先生。

辰之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日

月份牌



李教星火
群号: 578505007



李教星火 QQ 群

群内有海量李教相关资料，同时聚集着众多李教资深读者，能够为李教读者提供交流与学习的绝佳场所，期待您的加入。

大李教全集 5。0

由 wjm_tcy 等众多李教研究者耗时十余年，集大量人力物力制成，汇聚李教书籍、影音三千一百四十余万字的大李教全集 5。0 版本已于 2023 年正式上线，诚为李教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搜索 <https://books.leeao.net>，即可在线浏览。

AI 李教

AI 李教基于 deepseekr1671B 大模型，使用的知识库为《大李教全集 5。0》，可帮助读者回答大量李教相关问题。

国内地址: ai.leeao.net

国外地址:

https://huggingface.co/spaces/aihuashanying/ai_leeao

月份牌



Liao 秘密书房

欢迎扫码关注公众号“Liao 秘密书房”，实时分享最新李敖研究成果、李敖研究资讯、李敖研究资料集刊。

投稿及联系

如您想在本集刊投稿或提出意见及建议，可通过以下邮箱：

2247674091@qq.com

Liaoagain@proton.me

与我们联系，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与您沟通。

欢迎各位来信来函，再次提前致谢。

李敖相关

全网搜索“李敖档案馆”、小红书“里奥大师”、抖音“海心”，实时分享李敖先生经典珍稀影音、李敖研究最新动态。

目 录

| | |
|--|-----|
| 李敖一家人与我的情谊 | 1 |
| 以名滚名的游士典型——李敖 | 6 |
| 李敖的狂言 | 15 |
| 重制《胡适家族世系表》暨说明 | 53 |
| 李敖这样的游士在台湾，恰是旧文明毁灭的标志 | 71 |
| 记一个自由主义的奉行者——李敖 | 75 |
| 李敖：不老的狂徒 | 78 |
| 和民进党前主席聊政治 | 90 |
| 李敖之父在营城新证 | 102 |
| 没有李敖以后的国民党 | 118 |
| 老党外追忆似水年华：我曾与李敖、郑南榕并肩作战 | 122 |
| 蔡英文 2018 年 3 月 18 日脸书 | 128 |
| 李敖，永远的党外 | 129 |
| 谢长廷：公投不能败 李敖：台湾先正名 谢语带哽咽说 有恶邻是台湾无可选择的命运 李强调自己是唯一为台独坐牢的外省人 谈判不该以一中为前提 | 132 |

| | |
|-----------------------------|-----|
| 与李敖分道扬镳的外省籍精英培育路线 | 138 |
| 记苦苓与我的陈年往事 | 143 |
| 专访李敖痛批台湾学运 | 148 |
| 历史的隐居者 | 159 |
|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 - 中共“台湾文化招安之旅” | 163 |
| 文人无行！主张全盘西化，罔顾民族大义，“台独”导师李敖 | 168 |
| 李敖——台湾民主的祸害 | 174 |
| 李敖中国之行评价各异 有肯定有失望 | 180 |
| 李敖在北大如何摸老虎屁股？ | 183 |
| 且看李敖给老虎屁股盖遮羞布——评复旦演讲 | 192 |
| 别只说郑南榕「台独烈士」！老党外：只会获半数国人尊敬 | 195 |
| 编辑室报告 | 198 |

李敖一家人与我的情谊

石文杰

李敖是我台中一中和台大历史系的学长，早在我念高二时就跟他见过面，在他台中市太平路的家—台中一中教职员宿舍，包括段钟潭（滚石唱片公司总经理）、程万春（长庚医院嘉义分院主治医师）、赵国庆（旅居美国，为电脑软体专家）、唐中南（艺术家）和我等五位同班同学，经常围坐沙发，听他天马行空地高谈阔论，对他崇拜不已。

记得李敖曾说「手段即目的，朋友也是敌人」、「北洋军阀比国民党更尊重学术、更有言论自由」等惊世骇俗的见解。后来我把历史系作为第一志愿，或多或少是受他影响。《李敖回忆录》两次提及我与他的交往经过，触动我详述这段陈年往事。

我是先认识李妈妈张桂贞的。高二时，我赁屋在国文老师陈联璋家，有一次遇到当时任职于台中一中训导处的张女士来陈老师家串门子。我冒昧地拿着李敖的著作请她签名，这突来的动作把她吓

了一跳，但当她知悉我当时就搜尽李敖的禁书后，从此结为忘年之交。



“李妈妈”张桂贞

李妈妈当时约 50 开外，打扮摩登入时，丰姿绰约，颇有北方贵妇人仪态，任职于一中训导处，每天负责登记统计、通知学生出缺席和请假事宜，因此和学生关系本就比较密切；而李爸爸李鼎彝曾任台中一中国文老师，已去世一些时日，李妈妈独居在偌大的日式宿舍，稍嫌孤独凄凉。

后来每当她北上与李敖相聚，就把家中钥匙交付予我，并在冰箱里存放不少食物，要我自行取用，而她往往一去大半个月，她家就暂时成为我的书房兼卧房。

李敖写过一篇「妈妈·弟弟·电影」，提到李妈妈沉迷于电影，热衷于追逐明星，我虽然没发现她当粉丝的一面，但的确见识到她对电影的热爱。每当有新片上映，她一定抢看首轮首映，事后还会

与我分享剧情和剧中的高潮迭起。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找不到她，去电影院找就对了。

有一次我正和李妈妈在客厅吃水果聊天时，突然看到隔壁邻家窗户冒出熊熊大火，原来是失火了，我赶紧拉着她的手往外冲，情急之际，她竟然冲回卧房抱起一个熊宝宝和一座台灯，才跑出屋外，好在火势很快被扑灭，惊魂甫定的她才尴尬地说，这是李敖送她的礼物。

两年后我考上台大历史系，负笈台北，大约每半年会回中部一趟，每次都会特地前去看她，这时李敖已因政治原因身陷囹圄，每次看她皱纹又增添不少，而且愁容满面，心事重重，但再忙也会请我吃一顿大餐。

后来因宿舍拆除改建，李妈妈搬到双十路两层楼宿舍，当时李敖朋友蓝灯出版社的丁颖一家人搬来与她同住，还帮李敖卖书。我遇到了李敖当时还在念幼稚园的女儿李文（王尚勤所生），刚从美国送回来给姥姥照顾，多次一起吃饭，也曾带着李文去逛杂货店买糖果，不知现人在北京的她是否还记得？

李敖出狱后幽居独处，很少与外面接触，也不接电话，我知道李妈妈已经退休，并搬到台北与儿子李敖同住，但很少再联络。直到后来我在台中任教，每周末北上帮郑南榕编丛书，才在魏廷昱的带领下，与李敖正式见面，为他寻找珍本秘藏，承他厚爱赠予一部影印机。当李敖获知初中的国文老师杨锦铨在我任教的私立高中兼课，便托我带去几本著作送他，这段经过在《李敖回忆录》中亦有提及。

李敖有个弟弟叫李放，两人长得 very 像，我在李妈妈家认识他，当时他已高中毕业，正在服兵役。李放和哥哥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他不爱念书，高初中虽也念台中一中，却经常让李妈妈操心。服完兵役后和白先勇的弟弟白先敬一起做电冰箱生意，收购美军的大型冰箱



“李弟弟”李放

再转售，赚取差价，后来改帮李敖处理出版社业务。李敖常说李放「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趣事，那是有一次李放因为内急，又不愿使

用印刷厂的肮脏厕所，特地回家如厕，结果几千本《千秋评论》丛书，被警总禁书官抄得一干二净。

李敖交友满天下，但敌人也不少，记得李敖 50 岁生日时，郑南榕出特刊祝贺，并且要大家写几句话，当时我说：「伴君如伴虎」，应当李敖的朋友，不当他的敌人，因为他对朋友会两肋插刀，拔刀相助；对敌人却是穷追不舍，赶尽杀绝。

李敖有两个忠肝义胆，一个是蓝灯出版社的丁颖，一个是仙人掌/故乡出版社的林秉钦，两人都是磊落的谦谦君子。李敖坐牢时，丁颖帮他卖了数万本文星旧书，林秉钦在李敖第二次坐牢时，帮他做内应，每月定期出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尤其是李敖刚出土城看守所时，召开记者会揭发监狱黑幕，全文就登在该书第 6 集，同时出现在记者会现场，震惊全场！

另外，我大学的恩师——石锦是李敖的姐夫，他教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后来举家移民去美国。

以上这些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在我心中历历在目，如今总算落笔为文，其情其景仍然恍如昨日，栩栩如生。

以名滚名的游士典型——李敖

刘仲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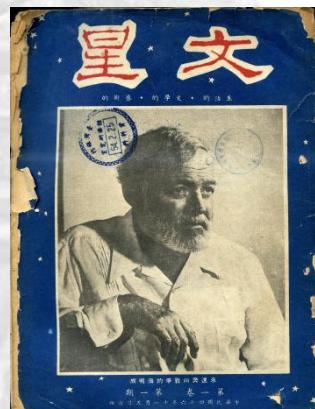
蒋介石政权通过二二八事件、土地改革、接收敌产和经济国有化，基本铲除了台湾社会自发形成的土豪或凝结核，为自己带来的流亡者空出了生态位，否则他们在哪儿都安置不了。满洲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虽然也会零星使用铁血的镇



刘仲敬

压手段，但部分出于君主国的保守本性，主要因为缺乏列宁主义的社会工程学机器，在系统性方面达不到同样的水准，正如国民党出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软弱性，在彻底性方面达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样水准。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社会工程，一九九〇年代以后的台湾民族主义大概就会在一

九六〇年代出现了。一九二〇年代以后繁盛的日语文学和台语白话文学，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后出现了断层。蒋介石政权带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残余文人，在视窗期占据了这个真空。国民党政府如果想要抹去日语和台语的影响，就必须借重他们推广新文化运动发明的白话文，然而新文化运动的无根性和除根性天然导向共产主义，又不能不引起流亡者的深刻恐惧。事实上，这种两难处境正是国民党本身的特征。如果没有苏联，国民党就不可能取得政权，然而只要有了苏联，国民党就不可能保住政权。这种两难处境产生了一九六〇年代的《文星》杂志，《文星》造就了作为公共人物的李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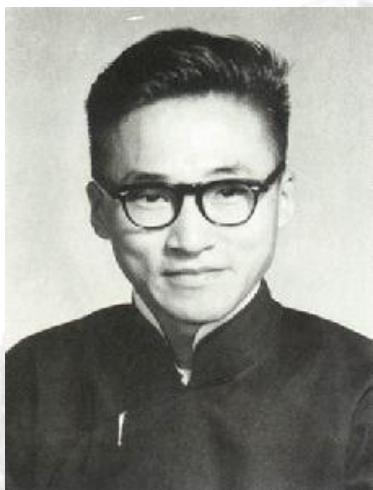


《文星》

《文星》在国民党最失意的派系保护下为万马齐喑的台湾文坛开了一扇小小的天窗，从列宁主义生态学角度讲，无异于《自由中国》从政治领域退到了文艺领域。得志的派系抢占政治、军事、情报部门，边缘的派系得到了经济、社会部门。文化部门留给了那些在党国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但目前已经只有

混吃等死的位置可以安放的派系。李敖在青年时代的小伙伴居浩然、萧孟能都是这种派系的子弟，永远无法忘记他们的父、祖作为国民党元老叱咤风云的时代，蒋介石还是一位无人保护、无人赏识的孤寒子弟，更不能原谅蒋介石父子在台湾提拔任用的新生代实权人物。他们的满腔怨恨和嫉妒以文学和思想形式表现出来，在不懂列宁主义操作模式和演化历史，喜欢用最为廉价和肤浅的符号性辞令判断和分类的局外人眼中，就成了「自由主义」、「开明人士」、甚至「民主反对力量」，但他们的开明姿态和反对姿态本身就是中国殖民者特权的一部分，因为台湾被殖民者社会即使作出同样事情的极小一部分，都会遭到严厉和及时的取缔，结果根本不会让局外人有机会看到。只要被殖民者社会强大到足以产生真实的「民主反对力量」，阶级生态的基本格局就会迫使这些符号经营者逃回自己的真实位置。李敖的家族在殖民者社会当中的地位和他的保护人在殖民者统治集团当中的地位，犹如照镜人和镜中像。萧孟能对李敖的提携，本质上是派系招募孤寒子弟为家臣的政治行动。蒋经国对宋楚

瑜的提携，属于类似的机制，只是政治家需要的素质，跟文学家有所不同而已。



李敖

(1935-2018)

李敖的出身和环境，都比大多数中国殖民者家庭的子弟更适合进入上述角色。他的父亲李鼎彝和他的老师严侨，都是陈独秀思想和言论的三、四道贩子。思想先驱者和粉丝传播者在信息量方面的差别，通常低于百分之一，但结果通常是前者赢家通吃，后者一无所得。如果你把思想市场看作一个演化系统，那么奖励实际上属于风险收益的一种，

winner 的资格通常不是取决于产品，而是取决于勇气和机遇。李敖青年时代的作品，除了个人风格和青春朝气以外，没有给多重拷贝的原始版本增加任何信息量，因此引用价值不大。他的价值，也是其原版价值的一个子集。他们都是拙劣的西方负典传播者，失败的东亚文化泛民族主义发明家。他们羡慕西方文明的果实，但对西方

文明的基石，非但缺乏了解，而且充满敌意，力图用西方解构者的技术，锯断自己坐在上面的树枝，循其思想内在的逻辑，走向共产主义，只是由于境遇的差异和寿命的长短，定格在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李鼎彝、严侨和李敖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生命在其特殊的环境中，恰好发展到其对应人物刘和珍、林昭和江青的同等段位。



李鼎彝

(1899-1955)

李敖在《文星》时代的作品，达到了他毕生文学成就的巅峰。只有这段时间，他才具备不计功利的精益求精和比较纯粹的好奇心，如果自恋的虚荣，不属于功利范畴的话。此后由于牢狱之灾和名人之累，他的作品范围缩小到现实政治和私人恩怨的一孔之见。文学品质日渐粗疏，最终变得跟寻常的时评家和杂文家毫无区别了。名气和金钱一样，最初的一百块比后来的一百万更加难得，越过初始阈值以后，只要经常活动以保持存在感，以名生名、以钱生钱都是不必经过大脑的，在

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精进不止，就需要近乎宗教热忱的信念和责任感。游士很少具备两者当中的任何一种，李敖明显是两者都不具备。

李敖第一次入狱，是因为他恃才傲物，言论逾越了政治保护人能够容忍的边界，以后的入狱就纯属私人恩怨，但并不妨碍他将所有的不幸都发明为国民党的迫害，然后变现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出狱以后，加入了（国民）党外的政治活动，在少数民选职位的竞选宣传，以英明导师自居，然后挑出不肯乖乖做粉丝的一部分，予以嬉笑怒骂。无论如何，这一阶段（戒严时代的最后十年）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此后纵然名义职位更高，实际重要性和影响力却是每况愈下的。顺便说一句，这是文人在转型期的普遍模式。当时的外部形势注定了所有人都是败多胜少，自恋狂魔的失败就像布朗神父的树叶，隐藏在森林当中毫不引人注目。他的言论得不到现实的检验，在转型期不难招募大批寻找方向的粉丝。名人对粉丝的影响力也是一种隐形的权力，颇能考验当事人的品格。李敖不是经得住考验的人，在最庸俗的金钱和女色方面都败笔累累。解严以后，成功的真实可能性出现了。言论的泡沫在「大狗小狗一起叫」的嘈杂

中失去了意义，事实很快就会证明自恋狂魔属于最不适合从政的类别。民选政治家必须擅长为各种真实或想象的失败提供出气筒服务，自恋狂魔必然反过来痛斥人民的愚蠢和庸俗。台湾的选民对待李敖，已经算是超级厚道了。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民族构建的需要，把厚道作为民族性格的品牌，跟两个列宁主义殖民政权的刻薄寡恩形成黑白对照，正如波兰民族发明家必然强调波兰贵族的骑士精神和莫斯科人的亚细亚式奴性。

李敖失败的特殊原因，在于「台湾的民主化」只是一句模糊的外交辞令。「民主」一词一次经过二战、冷战以来的话语权斗争，已经不再限于古希腊的本义，变成一锅各取所需的观念大杂烩，包含了平等化、自由化、统治权转移和国民共同体构建多重涵义。「台湾的民主化」本质上属于台湾民族的构建，自然体现为针对中国（列宁主义东亚殖民政权）的去殖民化。东亚奥斯曼主义者作为列宁主义殖民体系的白手套，必然先于其身体感受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痛苦。李敖对国民党的仇恨，主要源于私人恩怨；反对国民党的勇气，主要源于殖民政权对「自家浮浪子弟」下不了狠手的舔犊之

情。殖民者的社会由共产国际培训的半列宁主义者残余和美国培训的技术官僚组成，日益强大的后者将日益衰弱的前者捆住了手脚，两者都缺乏土豪性和有机性，犹如无根无果的插花，纵然娇艳一时，终归后继无人。被殖民者的社会虽然被征服者剪去了最鲜艳的花朵和最成熟的果实，但原封不动的根基和土壤自然会养出下一代的土豪，彻底铲除土壤的沙漠化工程又非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列宁主义嫡系不能胜任，超出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半列宁主义者的能力和勇气范围。土豪乔治·华盛顿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社会就不再有兴趣倾听游客汤玛斯·潘恩的聒噪了。新稳态只要初具规模，扰乱旧制度的游客就会回到符合自身德性的原位。他们过去是边缘人，现在仍然是边缘人，只不过在新旧交替的短暂视窗期，一度产生了自己相当重要的幻觉。民主社会不再用监狱收容边缘人，而是让他们在越来越寂寞的小圈子里淘汰自己。

自知之明不是李敖的特长，自恋狂魔尤其易为廉价的粉丝和廉价的恭维所误。言论市场的开放，使得任何人只要稍微勤快一点，都不愁得不到一定数量的读者，结果是纵容他日益走向粗制滥造的

方向。他把任何反对意见都解释成政敌的迫害和人民的愚蠢，最后连起码的文学判断力都丧失了。《北京法源寺》对他个人而言，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失败，证明他缺乏塑造立体人物的基本功，只能将所有人物和情节简化为思想和政治符号。这是他为大批量生产时评和杂文，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上述两类文字占了他产出的九成以上，甚至称之为「作品」都有些勉强，主要效果就是维持他自恋的泡沫，而且愈往后期愈是如此。拉·封丹寓言诗描绘飞虫在马车上方嗡嗡旋转，一面指教马儿和马车夫应该怎样工作，一面宣称马车的前进都是它的功劳，就是他们这种人的写照。马车最后驶向李大师飞行方向相反的地方，使他的言论看上去像个笑话。他在九十年代断言台独注定是票房毒药，民进党永远不会逾越三成（支持率）政党的境界。此后，他的时评就变成了《柏林之围》的漫画连载版。他以「党外导师」起家从政，却眼睁睁看着当年同僚的徒子徒孙纷纷拜相开府，自己一年比一年形单影只，只得依附当年仇敌国民党极端派的残余郁慕明、宋楚瑜、章孝慈。

（本文选自《近代史的堕落：民国文人卷》）

李敖的狂言

黄道京，李仲凯

李敖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李敖自诩为五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曾有“五百年内写作白话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还是李敖”的狂言。其著作甚多，主要以散文和评论文章为主，《李敖大全集》是他大部分著作的合



《李敖大全集》

集。有《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胡适评传》《闻变研究与文星讼案》《上下古今谈》《李敖文存》等著作传世，近

年出版的有《李敖的情话》《蒋介石研究文集》《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李敖议坛哀思录》《李敖有话说》等，总共一百多本著作，而李敖前后共有九十六本书被禁，创下历史记录。

李敖的作品以文字尖锐辛辣、批评不留情面著称。例如他曾评价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这些措词严厉的评价在学界和民间都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同时也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李敖以嬉笑怒骂为己任，遭他抨击责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三千位，在古今中外“骂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有人说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无顾忌地骂谁”。的确，多年来，他与台湾当局一直政见不合，对台湾时政一直进行抨击。他骂过国民党，骂过李登辉，痛斥过台独，也攻击过陈水扁。正是因为“狂言”，他曾坐过两次牢，时间长达六年多。

一、生逢乱世，颠沛流离

李敖 1935 年 4 月 25 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哈尔滨，祖籍本是山东潍县，后来因为他爷爷闯关东到了吉林，遂改为吉林省扶余县。

据《李敖回忆录》称，他的远籍是云南乌撒，在明太祖洪武年

间才自乌撤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布衣，在潍县五百年，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一直安土重迁，直到他爷爷这一辈，才发生了大变化。

李敖的爷爷名叫李凤亭，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同治元年（1862）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与母亲一起讨饭，母亲不幸被恶犬咬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自然也随着“下关东”了。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构成极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人“去西部”一样。

李敖的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的，他的一生，充满了变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经历

复杂。他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最令李敖扬眉吐气的是他爷爷的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他爷爷做流氓的时代。一天在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个赌棍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急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输了，就要以肉赔肉。某赌徒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漓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庄家李凤亭却面不改色地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

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从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一下震住了那赌徒。

二是他爷爷七十多岁以后，和大儿子一家住在郊外。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屋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李敖的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李家入关，最后运到故都。若非不便搬运，也许还会带到台湾去呢。李凤亭虽说比不上独退曹兵的张翼德，但在李敖看来也颇有几分神勇。

到李敖的父亲这代，李家的家风变了。李敖的父亲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那时正是北

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李鼎彝 1926 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被聘为某中学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



李锡恩
(1897-1979)

当时的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李敖的爷爷。而李敖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看来，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也不一定灵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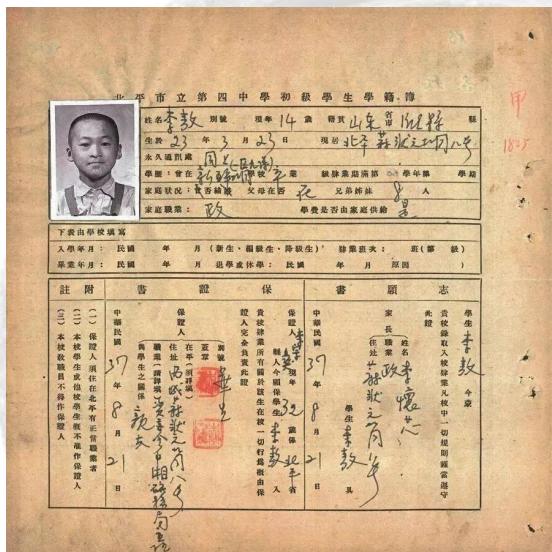
李鼎彝回东北时，东北正处于它的历史黄金期。但“九一八”事变后，广袤的黑土地尽陷敌手，老百姓尝到了当

亡国奴的滋味。为不做亡国奴，李鼎彝决定率全家迁到北平。当时全家计有爷爷、奶奶、姥姥（外婆）、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姑、老姨、大姊、二姊、三姊、四姊、李教，再加大爷和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这样一家子南迁关内，可谓浩浩荡荡，也自然是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可是到北平后不久，又发生“七七”事变，国民党又弃人民而逃。李教一家在关内又做了亡国奴。李鼎彝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有能力南迁了。

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活动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武装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实际军事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伺机”之中，李鼎彝当时就是马占山的秘密盟员，这一身份，他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在北平，李教一家十几口就住在姥爷的一位亲戚名叫沈铭三的一处住所，在东城灯市口附近的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从内务部街东口，向左转，是朝阳门南小街，再向右转，是新鲜胡同。这里有座小学，就叫新鲜胡同小学。1942年，七岁的李教走进了新鲜胡同

小学。李敖出身于读书人家，家庭教育自然是不会少的，李敖在学校的成績自是骄人。1946年7月，李敖念完四年级，就是“初小”毕业，获得一张文凭。这是李敖平生第一次得到文凭。李敖从小爱



李敖北京四中学籍簿

李敖课外书读得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好。六年级的时候，他被选为班上自治会主席，又当了学校图书馆馆长，被选为“模范儿童”，他还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和藏书室。1948年李敖完成了高级小学的学业，毕业了。他报考了两个中学。李敖的二姐李珣说：“他考

书。在新鲜胡同小学念书期间，最引起李敖兴趣的，一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橱窗，窗内有蒸汽火车模型，非常惹人爱；另一是学校音乐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一排排整齐摆着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升入五年级以后，

北京男一中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差一点就中榜眼，而考男四中教弟名列前茅，揭榜那天爸爸回家那个得意呀！爸爸兴高采烈地说，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愈往前愈担心没考中，没想到原来李敖的名字高挂榜首……”过了暑假，李敖进入北平第四中学初一年级。

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北方的统治局面江河日下，北平岌岌可危。李敖的父亲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全家分成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先到上海打前站，安排立脚之处。他在虹口区提篮桥附近上海监狱的对面买了一所房子，是一楼和二楼，三楼是六叔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和一位老佣人第二批乘飞机走。我和三姐和四姐是第三批，为了省钱，改乘轮船。1948年冬天，我们三人由五叔陪同，先去天津，路上第一次看到战乱下苦难的百姓和满目疮痍的大地。大姐上了大学，而且刚刚被选为‘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她们两人为第四批，晚一点走。不想，这一‘晚’，就‘晚’到出不去了，以至跟全家人到九十年代才得相见。”李敖如是说。

这时李敖生活的又一个转折，从生活优越的“少爷”一下跌落下来，然而李敖还是坦然面对，他在书里寻找慰藉。虽然到了上海，全家十九口人，没有一个找到职业的，但是父亲还是极力支持他的学习。在上海那段日子里，李敖专心念书，没有任何娱乐。李敖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几家书店，李敖买了不少书。这构成李敖藏书的一大部分。在上海动荡的日子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令李敖震惊，心寒。

他们一家于 1949 年 5 月 11 日又不得不搭轮船离开上海，“逃到”台湾。这次仓皇“出逃”时，李敖十四岁，带着个人的藏书五百本。李敖如此的视书如命，确实让人感动，他的思想来源于他读书汲取知识后的一点一滴的积淀、发酵。变迁的经历对李敖以后敢说敢做、疾呼人民的心声，是有很大影响的。

到了台中，李敖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是艰难了。可是他还是有继续上学的机会，在父亲供职的台中一中读书。在家里，他也是有特殊的待遇，一家九口八个榻榻米大的房子，李敖一人独享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在这小天地里，他一桌一椅四壁书。在这里居住的十

三年，李敖勤奋读书，辛苦写作，奠定了他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础。李敖的成绩还是一贯的保持优异，参加各类演讲、辩论、作文比赛屡屡获奖，还将奖金用于买书。除参加各种比赛，李敖高一时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

1953年他十八岁，念了十几天的高三，就自愿休学在家。北大毕业的父亲，发扬北大精神，支持他休学。于是李敖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的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在回顾成长过程时，李敖深有感慨地说：“我有这么好的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读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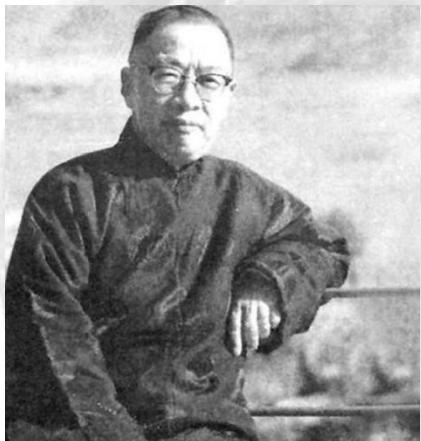
李敖提到，他最难忘的老师就是严侨（高中时的数学和生物老师）。引起李敖更大兴趣的是严侨有一位显赫的祖父——严复。在一次专题演讲中，严侨竟然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



严侨

(1920-1974)

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应译为“演化”。严侨那种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给李敖留下抹不掉的印象。然而，严侨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的“特务”，他也曾深深地影响李敖，甚至李敖梦想跟他回大陆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在李敖十八岁休学在家时，严侨被捕，梦想也破灭了。在中学时期，李敖



钱穆

(1895-1990)

结识了另一位重要人物——钱穆。此时，李敖在思想上很接近钱穆。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相见如故。

钱穆还向李敖解答研治国学的方法。但是，有想法、个性强的李敖最终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李敖说：“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了。对钱穆，我终于定论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

朴学成就，但对于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真是怪事！”

1954年暑假，李敖以高二肄业身份参加大专联招考试，这时他十九岁。虽然李敖各科成绩不错，但是数学一直以来都是他的软肋，每次考试都要拉分数。这次也不例外，致使李敖与他的第一志愿——台湾大学中文系——因几分之差而失之交臂。最终阴差阳错间，李敖进入台大的法律专修科。但是李敖志在学文不在习法，没考入台大文学院心有不甘，于是决定重考。但学校规定台大学生不能重考本校，除非先自动退学。李敖终因兴趣不合，毅然退学，结束了在法律专修科学习的二百八十七天的日子。但是在法律专修科呆了接近三百天，于李敖也不完全是一种损失。读李敖的书，你会感到他在法律方面是很有修养的，不仅熟悉法律条文，而且懂法学理论，论辩起来，不逊色于一名律师。他后来打官司不请律师，都是自我辩护，所写辩护词，理正词严，教人无法驳倒。

退学后，由于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为他恶补数

学，结果李敖重考大学时数学考到 59 分，如愿以偿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并且是成绩名列前茅。

二、台大长袍怪

进入台大文学院的拱门，感受到比较自由的气氛，李敖一度感到很满足。可是，很快李敖失望了，觉得学院的空气污浊得不堪忍受。他认为大学的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曾在文章里写道：“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混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在当时就对大学的教育有这样的见解和态度，在今天也是很多人都比不上的。李敖始终自喜，始终自信他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以致大学四年成绩平

平。

大学时代的李敖，一袭长袍成了他的“标志性装束”。有人曾列举台大有“四怪三丑”，而怪丑之首就是李敖这个长袍怪。他自己曾骄傲地说过，在台大，要说声名显赫的人物，除了校长钱穆，就是他李敖了。没有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位穿长袍的，除非他是瞎子，可是瞎子也得听说过李某人，除非他愿意做聋子。

在台大，当时穿长袍的人不少，但只有李敖独享“长袍怪”的美称。教中国通史的夏教授，也整天一件旧长袍不离身。可一年中最热的那一两个月，他就坚持不下去了，也得破例地“夏威夷”一番。盛夏的一天，夏教授见李敖这小子仍穿着黑大褂，特地绕到李敖面前，一声不响地盯着李敖好一阵，摇摇头，说：“你简直比我还顽固。”

还有一次，一位颇有灵性的女孩子，对他说：“李敖，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么热的天气你还穿这玩意儿，难道你不热吗？”

李敖望着她那一副救世精神的脸蛋，慢吞吞地说：“冬天那么

凉，你还要穿裙子露小腿，难道你不冷吗？”女孩似有所悟，一句话没说，黯然离去。

李敖之怪由来已久。早在北京的时候，火热的夏季里，姐妹们都穿短短的连衣裙，而李敖却整天穿着长裤，还像大兵似的绑着裹腿。要他穿短裤，他居然说，那会露着大腿，有伤风化。

有时李敖又很“时尚”。1955年4月27日，李敖刚过完二十岁生日，父亲就去世了。李鼎彝的丧事办得很隆重，有两千人参加了公祭。那时李敖受胡适影响，坚持改革丧礼。按照传统，孝子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给前来吊丧的人磕头。李敖把这一套全改了，并且当众一滴泪也不掉。台中市一中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委婉地劝他：“李敖，你读书明礼，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谁知李敖反唇相讥：“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陪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鄢先生顿时语塞。

在台大，令李敖一生感恩难忘的是辽金元史专家姚从吾老师。姚从吾（1894~1970），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

吾，中年以后以号行。他留学德国，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
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
口乱牙翻滚，
然后发音。他
的声音中气
十足，道地的
河南口音。最
可笑的是他
讲课时老爱
用手揉搓自
己的大肚皮，



姚从吾和李敖

自称兄弟。闹得一班女生下了课乱笑：“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
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啊！”

姚教授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
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
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

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据说，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赶上解放军攻打开封，便化装成一老农，从乱军中逃了出来。其实，姚校长根本不用化装，天生本色就是一副农民相。

姚从吾在大陆时本是铁杆国民党，并曾奉命组建中国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但到了台湾，他居然拒绝办理国民党归队登记。李敖对此很表佩服。

姚从吾教授在李敖大二时教《辽金元史》，大三时教《史学方法》。大四时指导李敖写论文。在学问上，姚从吾对李敖的影响有限，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李敖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其一生感恩难忘。李敖永远感念姚教授的人品：与人为善，不耻下问，赏识李敖，全心全意地帮助李敖这个学生。

1961年12月13日，李敖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一封长信：

长期会（台湾学术机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简称）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

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個一毛钱是奢侈！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助此人“月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汨没而不见也！”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

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先生收到信后，立即给他回信，并送给他一千元钱。为此事，姚先生还在一天之内，给李敖的同班好友萧启庆写了三封信，其中一封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了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我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

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一、兼任助理遭受意外的挫折；二、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三、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四、我在北平时颇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姚先生是李敖的老师，又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一般人可能觉得李敖与胡适的相识当出于姚先生的引荐。其实不然。李在北平念初一的时候，就久闻学者胡适的大名，到台湾台中一中时，便借阅了《胡适文选》，又在旧书店买了《胡适文存》一、二集，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52年10月2日，胡适到台中讲演，头天李敖在火车站见到胡适，并当面递给他一封信。这是李敖认识胡适的开始。



胡适

(1891-1962)

1954年，台湾大学《这一代》杂志的编辑向李敖约稿，李敖写了篇《从读〈胡适文存〉谈起》，结果编辑有顾虑，没采用，退了稿。三年后，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发表了李敖此文。

又过了一年，胡适从美国回台，约台大学生李敖见面，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还透露说，李敖的那篇文章，雷震特别写信向他推荐过。

其实，李敖在给姚教授写长信之前已经写信给胡适—胡适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惟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

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发生而已。

这封信是十月六日写的。胡适收到信后，在七日夜即复信给李敖：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一定设法补救。

祝你好。

胡适 1961.10.7 夜

李敖收到胡适的信和那一千元的支票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虽然是他父亲的老师，但胡先生早已忘记了李鼎彝的名字。他对李敖的赏识纯粹出于李敖的治学天才和成绩。他有眼力看出李敖是有潜力的。能这样对待一个年轻人，胡先生的确跟别的老先生不一样。

李敖在“双十节”那天没有到胡适那里玩，而是写了五千字的长信给胡适，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叙说了自己的身世，包括跟地下共产党严侨老师的关系，以及后来如何受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十分感人。胡适收到信后，也深受感动，拿给了好几个人看。结果在胡适死后，某小人便将这信公诸于世，当然，矛头是冲着李敖的。但李敖是“匪谍”，胡适也脱不了干系。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是位文化名人，但同时他又是位悲剧性人物。抗战时期，他担任驻美大使。抗战胜利，他回国任北大校长。到台湾后，他又当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常请他用餐，咨询国事。看似风光，其实，他曾两次被国民党“围剿”。胡适在台湾，无论

是生前还是死后，都被国民党视为政治异己者予以提防和压制。而在大陆，早在中共建国之初，胡适即被毛泽东严厉批判。个中原委，殊堪玩味。

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谈话。谈话中有这么一句，“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者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于是，几乎台湾所有顽固势力发动了一场对胡适的大围剿。某教授在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上著文大骂“胡博士之担任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某党棍在自己主办的政治性刊物上，用尽所有下流语言辱骂这位海峡两岸共同称为“洋奴”的胡适。

胡适的性格，早在留学美国时就定型了；老人的他，自然愈加深沉。面对如此一片辱骂、指责和叫嚣，他采取不理会、不答辩的态度。他的朋友和门徒也像他一样沉默，没有人敢贸然出战。

这时，李敖站出来了。1961年年底，李敖发表了《播种者胡适》。此文肯定了胡适先生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民主宪政上的贡献，

在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上的贡献。“胡适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但同时，李敖也认为：“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寸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文章中还有其他一些对胡适不敬甚至讥讽的地方。

《播种者胡适》虽被外界认为是卫护胡适的文章，但文章有些地方直言无隐，如说胡适给女弟子关窗户以示体贴，当女学生疯狂追求他的时候，也绝不动心之类。胡适看了，十分不快。据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中记述，胡适对杨说李敖这篇文章：“你看，这说的是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

胡适为此还专门给李敖写信，可是信没写完人就死了，胡适死后一群亲朋好友把他“垄断”，这封信也就被扣押下来了。直到三十六年后，李敖才得见这封信的影印件。在信里，胡适指出李敖文章多处“失实”：

李敖先生：

我知道这一个月以来，有不少称赞你做的《播种者胡适》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写这封信，给你浇几滴冷水。

我觉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应该有人替你指点出来。很可能的，在台湾就没有人肯给你指点出来。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担任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够正确的事实。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买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去看他”——我曾帮过他的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看过他（我至今还想设法搜全他的著作，已搜集到十几本了。我盼望将来你可以帮我搜集。我觉得他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又如……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B.A，并没有经过M.A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后来，李敖在其《快意恩仇录》里对这些“失实”一一作出了

回应，他说的都有出处，是胡适记错了一一可是，驾鹤西去的胡适已不能知道了。

三、强烈的反叛性

翻开李敖的历史，可见他一直都在“压迫”中生活：出生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少年时生活在中国最动乱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到了台湾后，又深受国民党的压制……另一方面，从小到大，家庭、父母姐妹又把他宠坏了，给了他一个宽松、放任的小环境。因此李敖的性格具有极其强烈的反叛性。

李敖的反叛性主要体现在反独裁、反传统、反“历史”上。

反独裁，对李敖而言，就是反国民党，反蒋介石。李敖一生都在与国民党斗，三次入狱，被禁书达九十六种之多，堪称世界纪录。李敖的政治杂文绝大多数是反国民党的，以杂文集《横眉对乱世》《黑夜的思索》《斗士与镣铐》等为代表。如《选他做皇帝算啦》中说雷



雷啸岑

(1896-1982)

啸岑，“故国大代表，他平日袖手领干薪，六年一票选总统，周而复始，至感麻烦，有天开玩笑说：‘我看不要每日付薪水给国大代表啦，干脆蒋总统一次付我们一大笔钱，我们选他做皇帝算啦。’”借雷啸岑口得出独裁统治者的面目：“大凡想亲自出马，做一国领袖者，基本上都有一种奉天承运的封建气象，‘天生德于予’，想当上现代皇帝—总统，以解决想当皇帝的需要。”李敖批判国民党腐败，在《国民党下班了》中用幽默的语言道：“别以为还有什么国民党吧，今天的国民党，八点钟上班，五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以后就不是国民党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再上班做国民党。国民党下班后，抱住老婆，或被老婆抱住；抱住小老婆，或被小老婆抱住……哪里还有什么国民党呀，谁还要做什么国民党呀。”李敖独自与岛内当权者的斗争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历程。在蒋氏当政时期，在自己的书一出即被禁的情况下，他接连推出了五本《蒋介石研究》，毫不留情地揭露蒋氏卖国内幕。他还写了两本书批判蒋经国，写了两本书批判李登辉。对于当权的国民党和后来的民进党，他均有批判性的“大书伺候”。如此激烈地批判当代当权者，并且

能够安然存在于他们的势力之下，这在整个历史上也堪称罕见。

在李敖的“反叛”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李敖有李敖的一套思想，生性孤傲，因此也从不被所谓“道德”的教条束缚，练就了常人没有的独到的观察社会的眼光。由于他天生的反叛性格，致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有人评价说：“李敖在其作品中以空前绝后的勇气和不妥协的姿态对中国古老的传统中的某些负面东西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挑战与批判，并以其作品及人格为自由、民主、人权作出了牺牲和指明方向的贡献。”他在《传统下的独白》自序中说：“这本书共包括二十篇文章，篇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文’，有的谈男人的爱情，有的谈女人的衣裳，有的谈妈妈的梦幻，有的谈法律的荒谬，有的谈不讨老婆的‘不亦快哉’……各文的性质虽是杂拌儿，但是贯穿这杂拌儿的却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

在台湾，百姓对佛教、道教的神是极为尊重的，而李敖反其道而行之，写了一篇《神仙也要小便的》加以讽刺。他说：“我在《千秋评论》第二十三期《钞票肚皮尿》里，写过一篇《撒尿歌》，同

时刊出希腊神话中大力士海克力斯的小便图，证明神仙也要小便的。”

又说：“在中国古书中，神具人质，在形状方面，实在不如洋鬼子的明确。古书中有‘天体无形，人所不睹’的话，又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的话。”他又引用《诗经》中《生民》一诗曾写过“皇后级的”姜嫄，踩上一只大脚印而得到神胎的故事，说明：“可见中国人的上帝自是有形的，不然何来大脚印？问题只是不见首尾而已。但是此公既有脚，自然有四肢，有肛门，有那话儿……自然要大便，小便……依理自推，不在话下。”李敖最后得出结论：因为神具人质，所以神有人的喜怒哀乐，也有人的吃喝拉撒睡—神并不是那么严肃，严肃的那么高不可攀，严肃的连尿也撒不得。

在《传统下的独白》一书中，有他反叛传统的老人权威的《老年人和棒子》、反叛传统的婚姻与爱情观的《张飞的眼睛》、反叛传统的清教式礼仪的《由一丝不挂说起》，甚至反叛传统的医疗知识—《修改医师法，废止中医》。这一连串反叛传统的姿态，既让既得势力者大为跳脚，也让李敖短时间内升起成为许多年轻人—那些也想反叛却又怕被旧势力惩罚压垮的年轻人—的偶像。不过反讽

的是，李敖虽然经常用“文学”来称呼自己的作品，他的“文学”却和胡适一样，声言要反叛传统，但一直停留在“前现代”的阶段。因为他和胡适一样，缺乏像鲁迅那样看清人类存在的阴暗无奈的能力。于是他在传统里的独白，成功撕毁了传统的假面，却不曾带进真正现代的丰富语汇与深层意义。



鲁迅

(1881-1936)

李敖是历史科班毕业，不可能不懂历史，为什么说李敖反“历史”呢？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历史”指的是官方为了政治需要所做的“历史定论”。李敖反对它，恰恰是维护了历史的真实性。

鲁迅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成就、他的名望在大陆是不可指责的。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曾对李敖进行过专访，透过以大陆为主要传播市场的凤凰台，首次面向大陆观众。约两亿大陆观众

也见识了这位在台湾和海外备受争议的大作家的风采。李敖言词的犀利、知识的渊博，和他笔触锐利的作品一样，在大陆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专访中，主持人问李敖怎样评价鲁迅。李敖说：“我父亲是鲁迅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我对鲁迅的评价同大陆的不一样，我觉得鲁迅在大陆是过分被炒作过了。这个说法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这样讲过。鲁迅写《阿Q正传》这些东西蛮好，写《中国小说史略》也挺了不起。可他那些杂文其实并不好……第一个，他用的是日本文法，是从日本转过来的中文，那个中文很别扭。第二呢，他的情绪语言太多，把情绪语言抽走以后就没有资料了。你看我的文章，我也骂人，但把情绪语言抽掉后下面就是资料。就像一盘菜一样，你把辣椒抽走后下面是肉。懂我意思吗？鲁迅显然不是的。我认为鲁迅在这方面是过分被高估了。事实上鲁迅直到死，还拿国民党政府的钱，现在我们查出纪录来，还拿中央研究院的钱……”这就是李敖，特立独行，以自己的眼光剖析历史。

四、李敖与诺贝尔文学奖

李敖过去一直是被台湾当局打压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几乎被台湾人遗忘的作家。然而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说明他是一位受世界关注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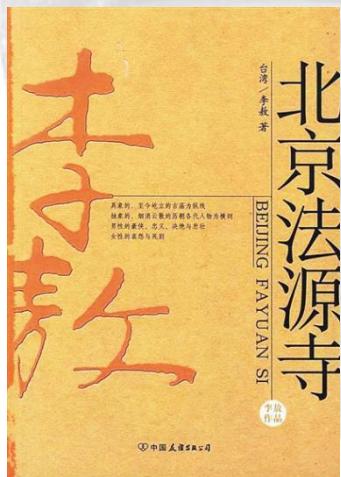
2000年，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据说在2000年初，李敖接到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评委会接受他为今年的诺贝尔奖候选人，而他是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一书获提名的。台湾不少报刊称，他是台湾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这一消息传出后，当时的台湾新党还为李敖举行了他的新作发行会，同时庆祝他的英文版的《北京法源寺》一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敖这次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列，主要是由台湾东吴大学的一批教授和学者向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出推荐的，在推荐的同时，还派专人翻译了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李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狱中创作的。整部小说以清末的戊戌变法的史实为题材，描写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中华民族的进步知识

分子，力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对危机四伏的大清王朝进行变革。该书还将这批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了复兴中华奋力追求、深刻探索的奋斗历程，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在歌颂他们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富强而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的同时，还展现了他们如何同腐朽的清王朝保守势力斗争的英勇事迹。

李敖自己曾经说过，《北京法源寺》一书描写的时代，和台湾今日腐败相去不远，并希望借助此书，让读者明白，“台湾再这样搞下去，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改良，最后终将沦为一空”。



《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一书，作者采用了与传统的小说不同的写法。李敖写这部小说时，既像是写历史专著，又像写批判性的杂文。有人说，正是“李敖写了一本不像小说的小说，他才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不过小说思绪蓬勃、意气风发，思想性好，倒真是大优点。可是单从文字讲，这篇作文到了中学教师的手里，那是必定

要扣分的。故事情节，有如醉酒，东一步西一步，踉跄不稳。人物性格，苍白无力，谈不上丰满，个个都是薄薄的驴皮影。另外，作者亲自上讲台、操教鞭，大讲其课，缺乏把道理渗透到情节中的功力。

一部《北京法源寺》，倒是让人看到李敖的历史功底。李敖先生说他感到兴奋，因为他不是只写写“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他替中国一百多年前的大人物写故事，他绕着几个重要的主题打转，表达他的思想，完成了这部史诗式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姑且不论受提名其实离得奖还很远这个事实，总之这次提名对李敖这位在台湾住了五十年还可以仅凭资料就把中国种种写得那么详细的作家而言，是一种肯定，而且他似乎还挺乐意接受的。

在《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中，梁启超与谭嗣同的对话，围绕出世、入世等等充满佛理的观念打转，其实是充分展露李敖知识的渊博，对佛学的钻研，以及他对出家人的态度。《北京法源寺》里面引经据典的部分很多，考究诗文、佛法的地方也着墨颇深。书中

对于中国古代的以往历史，作者也颇有研究，比如小说中提到中国人以龟壳卜卦的部分，小说里头是这样写的：“……龟在中国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中国人自古就烧龟的背，从裂纹里判断命运，在中国人眼中……龟是长寿的动物……”又比如：“宦官俗称太监，是一种割掉生殖器的男人……”还有婆婆经、妈妈经的部分：“中国人相信人命无常，为了要使小孩子平平安安长大，就用象征性的锁片锁住他。”

有记者曾问李敖：当你正式接到诺贝尔奖审核小组通知，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家的心情如何？他回答说：“心情是复杂的，我没有信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也觉得出了小小一点恶气。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很大的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考验评委会，颁奖颁 100 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他还曾对记者说：“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的，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这倒还算了，最

让我气不过的是评委会把和平奖颁发给罗斯福。在我眼里，罗斯福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尽管李敖自视甚高，不把一应文学大师巨匠放在眼中，口出狂言自诩为五百年来中国写作白话文之翘楚。但在台湾文艺界，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一致，尤其对他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有两点明显的不足。第一，他在中国来说还不能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只能说是一个在台湾有影响的作家，但不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另外，从他的作品来看，单靠《北京法源寺》一书参评诺贝尔文学奖，其材料还显得有些单薄。况且，《北京法源寺》这一部小说在国际上有多少译本？在世界上有何影响？似乎还很欠缺。一个在世界文学领域默默无闻的作家，要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似乎难有可能。

(本文选自《在中国谁最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重制《胡适家族世系表》暨说明

宋广波

前言：一部成功的年谱，谱前应配置“家族世系表”，以显示谱主的生物因缘。本人在继承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搜求、考证史料，重制《胡适家族世系表》。本世系表尽可能翔实地胪列胡适近亲人物的信息，尽可能考实其生卒年月日，相信对研究胡适家世有益。

一部成功的年谱，谱前应置有“家族世系表”，以显示谱主的生物因缘（即种族的本质或遗传）。优生学家潘光旦认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一端有他的生物因缘，一端也有他的文化因缘”，而中国传统的年谱、传记往往重视文化因缘而忽略生物因缘，

宋广波



这是一大缺陷。体现历史人物生物因缘最好的方式，就是家族世系表。家族世系表是为展示谱主在近亲世系中的位置及其与家人血缘

关系的，不必像宗谱、族谱那样从始迁祖记起，而只列出与谱主血亲较近的六、七代（上列四、五代，下列二、三代）即可。传统的家族世系表和宗谱族谱，还有三大不足，一是家生女子不出现于表中，二是夭折的子女不记入表中，三是表上人物好多都不记生卒时间。现在做家族世系表，应力避这些不足。

为胡适作传、编谱的学者，亦多重视其家族世系，李敖、胡颂平、耿云志师分别给胡适作有“家族世系表”。但随着新材料的挖掘，发现这些“世系表”多有讹谬和空白，故有重制之必要。

01 三种《胡适家族世系表》平议

（一）李敖制《胡适一家子的谱系》，见氏著《胡适评传》。此表上从胡适的曾祖记起，下止胡适唯一的孙子胡复，前后六代，颇得当。但表上人物信息，讹谬极多，有三类：

第一，世系错乱。据《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下简称《宗谱》）和胡传《钝夫年谱》等材料，胡适的曾祖父，是胡锡庸，而非表中所列的胡星五。《宗谱》记胡锡镛曰：“诰封奉政大夫，晋封通议大夫。字序东，生乾隆壬子十二月初十，卒道光壬午三月二十三。

胡適評傳

李
敖

《胡適评传》

娶曹氏（生乾隆癸丑六月十八，卒同治壬戌三月初十），生二子。”胡锡鏞次子即胡适祖父胡奎熙（谱名贞铸），而胡星五（谱名贞焘）乃胡锡鏞长子，即胡适伯祖父。显然，李氏之表却将兄弟误作父子了。《宗谱》记胡奎熙曰：“诰封奉政大夫，晋封通议大夫。名奎熙，字世恩，号律均，生道光壬午三月初九辰时。娶程氏

（生嘉庆庚辰七月十六，卒光绪丙戌二月十一申时），生五子。侧室张氏生道光壬寅十一月初五。”此谱记胡星五曰：“邑庠优增生。名奎照，字宗恩，号星五，事迹见《学林》，生嘉庆甲戌八月二十四，歿同治乙丑正月初九。”

第二，表中未列胡适父亲胡传的兄弟行。事实上，胡传的几位弟弟与胡适关系颇大，如其四弟胡玠，曾于1893年4月伴送冯顺弟、胡适母子到台南与胡传团聚。胡适回里后，又入其私塾从其学数年，

直至其离乡任阜阳县训导，是胡适父辈中除胡传以外又一“做官”的人。而胡玠之子嗣稷、嗣稻后来也与胡适多有来往。再如胡传的五弟胡守璐（祥祐公，号吉庭），因其在胡适留学后有所谓领取“宾兴费”之事，招致胡适大不满，对其言辞甚激而不留情，充分显现出胡适“爱名”的性格。但这本系误会，经解释后，胡适也就释然。因其无儿无女，胡适在其死后，仍接济其妻。像这样与胡适有密切关系的人，不出现在世系表上，是不合适的。

第三，尽管作者尽可能列出人物生卒年，但空白、错误亦多，且无月日。比如，胡适之女素斐的生卒年均不记。表中记胡适次子胡思杜道：“现居大陆”。事实是，思杜已于1957年9月21日自缢身亡。因当时两岸隔绝，即使胡适夫妇也不知思杜下落，所以，不应对此苛责。但表中不记思杜生年，却是疏漏。此外，胡传的两位前夫人（冯夫人、曹夫人）生年均不详，胡嗣稼之女卒年不详，胡思猷生卒年均无，等等。至于其他人物生卒年之错误，尤多，纠错于下：

胡适大姐大菊，是嫁给姓章的，而非姓张的。

胡适次兄胡觉，对胡适影响甚大，他死于1927年，表中误作1919年。

胡适三兄胡振之，是过继给胡传的堂兄胡守珍，不是胡珍。胡守珍是胡适的堂伯父，不是伯父。

胡嗣稼长子胡思明，生于1899年，该表误作1898年。

胡嗣稼次子胡思齐，生于1906年，该表误作1907年。

胡觉长子胡思聪，生于1900年，卒于1924年，该表分别误作1899年、1923年。

胡适三兄胡振之独子胡思永，生于1903年，该表误作1902年。

李敖是最早为胡适制“家族世系表”的学人，这种学术先行者的粗疏和错误，本属难免。而且，所以有上述错误和空白，是受制于当时条件——一些必要的资料都不得见。所以，笔者虽质直指出其错，但绝无苛责并争胜前贤之意。

(二) 胡颂平制《胡适家族世系表》，见氏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此表系在胡适为《钝夫年谱》所做《补世系表》基础上做成。胡颂平所作《世系表》记胡适高祖、曾祖、祖父、

父亲、叔父之信息（部分有生卒年），均出自《补世系表》，故未出现将伯祖误作曾祖的错误；胡适祖辈、父辈之前人物的子嗣也有体现，已较李敖所作



胡适与胡颂平

《谱系》详赡、丰富；此表和李敖的谱系一样，均将胡家生女子列于表上；表中部分人物也据《补世系表》列出生卒年。但未出现在《补世系表》的人物，即胡颂平所添加者，均无生卒年；表中个别人物如胡传的二弟胡玮，出生于 1846 年，而非 1864 年，显系手民之误；表中所列人物也有遗漏，如胡觉有幼子胡思宪，即不见于表上。



耿云志

(三) 耿云志师制《胡适家族世系表》，见师著《胡适年谱》。此表有一特点也很明显，即只列与胡适有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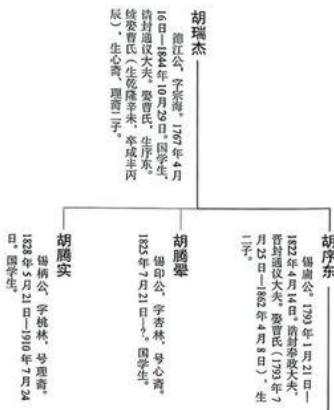
(1938-2024)

系血缘关系的父、祖，举凡胡适的叔父、伯祖父等均不列入。表中所记人物之生卒年，已较前二表详赡多多，足见学术研究后来居上之公例，但仍有沿袭以往的小错误。如：将胡觉之卒年误作1929年，将胡思明之生年误作1898年，将胡思永之生年误作1902年，将胡思齐之生年误作1907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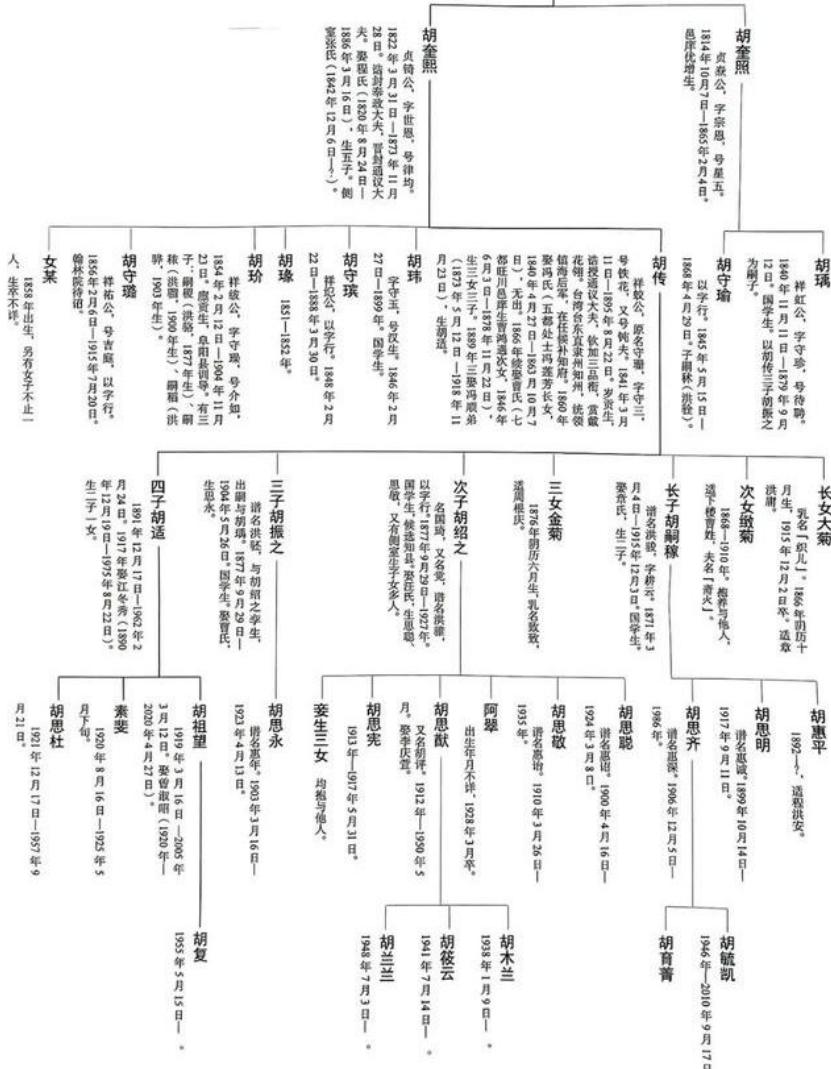
02 重制《胡适家族世系表》

笔者在充分研究和继承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又广泛搜求新材料，并加以反复考证，重制《胡适家族世系表》于下：

胡适家族世系表



《休戚·能否·與共》



今对此表作如下说明：

(一) 本表著录胡适先世人物，从其高祖胡瑞杰开始。所以起始于高祖，因胡适父亲胡传不仅对胡适影响甚大，也是家族中的关键人物。清廷对胡传之先世有所诰封，最近即到胡瑞杰。胡适的叔父、堂叔父、侄子、侄孙等，多在不同时期与胡适有关系，亦列入。

(二) 本表出现之胡适先世人物、兄长和部分侄子人名，据 1911 年修成之《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凡是 1911 年之后出生之胡适家人，则由作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查找有关资料完成。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此《宗谱》乃胡近仁主持纂修，谱中所示信息均极严谨而可靠。这可从所列人物之生卒年来说明。谱中说胡传之出生时间是道光辛丑二月十九戌时，而胡传《钝夫年谱》记道：“道光二十一年岁在癸丑二月十九戌时，钝夫生。”可互证。再举胡适三兄胡振之卒年一例。笔者为考证胡适 1904 年抵达上海的确切时间，须查胡振之病亡的时间，因胡适曾说他到沪后六个星期，其三兄病亡。2019 年前未见《宗谱》前，仅据胡适《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的写作时间“1908 年阴历四月十二日”，初步断定他死在 1904 年“四月十二日”。这一论断，与后来所见《宗谱》所记的“歿光绪

甲辰四月十二戌时”完全一致。再举胡思永生年一例。以往的世系表，均认为思永生于1902年，但《宗谱》却明确说是“光绪癸卯三月初七”。这也可从别处得到旁证。1923年，胡思永死后，其母曹细娟在给胡适夫妇的信里有“永儿十三个月就没父亲了”之语，从1904年旧历四月十二日（公历5月26日）上推十三个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 是1902年，而恰恰是《宗谱》所记的“光绪癸卯三月初七”恰与《宗谱》所记接榫。这类事例极多，不再多举。综上，《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是可靠的一手史料。故，笔者所制世系表，对《宗谱》所列人物，一概采信。

《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和传统宗谱、族谱一样，不记夭折的孩子和家生女子。据胡传《钝夫年谱》，我们知道胡传还有一位夭折的弟弟胡稼和至少三位妹妹，都不记于《宗谱》。《钝夫年谱》的“咸丰元年（1851年）”就记道：是年，他有一弟出生，名稼，次年夭折。《钝夫年谱》之1863年有记：女弟才六岁。可知，此女出生于1858年。同年又提到二妹、五妹，可知胡传不止有一位妹妹。本世系表则将以上诸人列入。

胡颂平制表对胡传兄弟行及侄子辈人名，已相对较全，耿云志师在胡觉子女目下又加“四子思宪”、“妾生之三女”两条，为胡颂平表所无。今笔者又据有关家族档案，找出胡觉还有一女名“阿翠”。

1928年江冬秀回乡修祖坟时，在与胡适的通信中多次提到一个叫“阿翠”的女子。3月10日，胡适复函江冬秀，请她斟酌处理阿翠订婚之事，并请江劝阿翠不要个性太强。不数日，又函江说到阿翠得病事，还说不敢把这消息告知胡觉次子胡思敬。稍后，就说阿翠死了，胡思敬“哭的不得了”。这个阿翠，是谁呢？从胡适不敢将其消息告诉胡思敬和她死后胡思敬痛哭两件事来看，很容易让人觉得她是胡觉的女儿。这也有旁证。1927年胡觉死后，胡适与胡近仁讨论其丧事时，也提到阿翠的婚事“不能苟且”，并请曹细娟帮忙留意，但须征得阿翠同意。而稍后，曹细娟来函表示：“阿翠年纪也不少了，二伯前时总想不着她的婚事。今岁回里，像是注意她的婚事了，东寻西觅。当时有好几家来谈及，但结果他仍未发出有年庚八字，将来如何是好呢？我是担不起这责任的，还须请你们替

她如何安顿，至盼，至盼。”从上述一提到阿翠就和胡觉联系起来看，就可让人断定阿翠即胡觉之女。事实是，胡觉的确有一女养在身边。1912年，其妾留下“三女一男”病故于上海，“男”即胡思猷，“三女”则因贫窘“螟蛉于他姓”，亦即耿云志师之世系表所说“妾生之三个女儿均抱给他人”。同一年，胡觉致函胡适说，其沪寓有“三男一女”。胡适的家族档案也提到过此女，如1923年胡觉就对江冬秀说，要把女儿和思敬带到北京来，因为女孩大了，川沙的房子太小了。这之后不久，江冬秀给胡适信中，提到：“不过阿翠一人放到上海，伏侍二哥，我不狠赞成，一来把一个小女孩子放到那块，没人照应他，怎样行？二哥又要出去做工，叫一个小女孩子怎行呢？”这是现存胡适的家族档案里首次提到“阿翠”。次年，胡觉偕思猷、阿翠回乡，办理胡思猷出嗣于曹细娟之事。曹细娟致函胡适夫妇说：“二伯同思猷及阿翠三人，于三月初四日平安抵家……家中自二伯和他的儿子、女到家后，很觉闹热了……”这可确证：阿翠乃胡觉之女。

胡觉第三子胡思猷，系胡觉四子中唯一婚娶并有后的儿子。其

所有教育、婚娶费用，均由胡适负担。1937年胡适赴美后，江冬秀依然资助思猷夫妇。胡思猷之妻李庆萱在抗战胜利后参加了中共领导都地下革命活动，她还通过胡适营救过秘密共产党员。胡思猷1950年自杀后，胡适甚为惋惜，其后人，本表亦著录。

胡思齐长子胡育凯系胡适侄孙，出生于1946年，其名即由胡适所取，本表亦著录。胡思齐是胡适大兄胡耕云之次子，其兄胡思明于1917年9月11日病故，胡适得耗后记道：“大哥所遗二子，其幼者名思齐，六七岁时忽发狂疾。疾已而口耳皆失其作用，遂成聋哑。今长者又死去，大哥有子而如无子矣。伤哉伤哉。”后来，胡思齐不止有一次婚姻，胡适夫妇亦常资助之。胡育凯乃胡思齐第三婚所生，育凯亦有二子，其长子胡善航现任中共上庄村支部书记。2010年后，胡适父母的坟被盗，太夫人冯顺弟的头颅被弃置于外，胡善航乃主持将其遗骸重新安葬。他曾亲告笔者，胡母头发依然长发完好，因其过世仅四十五岁有零，正值中年，故无白发。胡育凯及其弟胡育菁均有子嗣，这可证明胡适当年关于其大兄“有子而如无子”的断语完全不确。胡适的子侄辈中，有后者即此胡思齐和胡

思猷。

(三) 表中著录人物之生卒时间，凡《宗谱》有记者，均从此谱。凡在《宗谱》修成后去世之人物及新出生之家人，其生卒时间由作者查找各种资料（如家族档案、访问族人等）并加以考证得来。生卒时间尽量细化到年月日。笔者所以特别强调此点，基于两点：第一，历史本不能还原，但涉及历史人物、事件之有关信息，尤其是时间信息等尽可能精确，则更利于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本真。第二，更确切的时间信息，可与其它历史信息互证，得到意想不到的新认识。

前引三种胡适家族世系表，均列胡适的三位异母姐姐。李熬、胡颂平之表，只将大姐“大菊”的名字列出，耿师之表，则又列出二姐、三姐之名为緻菊、金菊。关于胡适大姐的生卒时间，李敖之表和耿师之表均记：1866—1915年，无误；但笔者又细化为：1866年阴历十月生，1915年12月2日卒。大菊出生年月据胡传《钝夫年谱》1866年之最后一条：“是年十月长女织儿生”。由此我们又知道大菊还有另一乳名“织儿”。大菊死亡时间据胡母谕胡适：“本

年家运极等乖舛，所有亲属中死亡之耗迭至，自尔七叔与三姐夫逝世后，复于十二月二号（即阴历十月廿六日），尔大姐病故……”关于胡适二姐、三姐的生卒时间，以上三表均阙如。笔者考出，胡适二姐的生卒年为：1868-1910 年。其出生年据胡传《钝夫年谱》1868 年所记：“钝夫之第三弟瑛……是年生一字……钝夫亦生次女。”其死亡时间据“壬子七月初五日（1912 年 8 月 17 日）”胡母谕胡适：“緻菊于大前年十二月已病故在家。”壬子年（1912 年）的大前年是 1909 年，但 1909 年的腊月，却是 1910 年的 1 月 11 日至 2 月 9 日。胡适三姐的出生年为 1876 年阴历六月，此据胡传《钝夫年谱》1877 年之“八月条”：“（八月）二十三日，钝夫妻曹氏孪生二子……而曹氏病几殆。盖去年六月曹氏甫产一女名致致，首位才十四阅月而三乳，气血乃大亏耗。”至于其卒年，则阙如待查。这样，胡适三姊和长兄出生的先后也就分明了：依次是大姐、二姐、大兄、三姐，这就修正了前三种世系表中“大姐、大兄、二姐、三姐”的排列顺序。

关于胡觉之卒年，一直有 1929 年之说，但笔者对此一向怀疑。

一个直接的证据，是向来重视胡适父母风水的江冬秀，1926年前多次为此事与胡觉商量。如1924年胡觉回乡后曾致函胡适说，“前接冬秀来函，嘱觅祖坟之地。此事因世俗种种之牵制，甚不易办。”又详谈亲自勘验胡传所购坟地事。1926年胡适游欧后，江冬秀又有两函谈到与胡觉商量此事，一函提到费用数额和其它细节，一函则说江冬秀拟于是年冬动工，胡觉却不以为然。但1928年上半年江冬秀亲到上庄修祖坟时，却从未提到胡觉，更不见任何与胡觉商量的材料，这显然不正常——毕竟胡觉是兄，对父母之事更要表达意见。一个最有可能的理由是：体弱多病的胡觉此时已死。1928年1月5日，胡适致函胡近仁，说到：“祥善、吉卿……绍之五人均应在学校内立一种永久纪念。”足见笔者判断不错，胡觉此时确已死。在胡适的家族档案里，发现有1927年胡觉两子分别给胡适的信，都提到胡觉的死。这年12月14日，胡思猷禀胡适道：“……我父亲死后的事，多承叔父的好意，一一料理的完美无比，我心中很是感激。但多是自家人，所以也不再说客气的话了。”这说明，这之前胡觉已死。而在两个多月前的10月3日，胡觉次子胡思敬禀胡适，提到

“自经吾父亲逝世之后”，说明 10 月 3 日之前胡觉即已死。至此，可断定：胡觉是 1927 年去世无疑了。但胡觉死在几月几日呢？2018 年出版的《胡适中文书信集》收入了一封 1927 年 9 月 14 日胡适复胡近仁的信，信中说：“收到八月初八日的信之后，我就把思敬叫回来，叫他自己斟酌。他也愿意赶回去，只愁没有妥伴。……今日发一电给你，说‘如必须敬归，乞电覆’。发电之后，又接得你十三日的长信。……绍之丧事既已定期出殡，敬赶回来也无益了……不必作归计了。”此信表明，最晚 1927 年的八月初八（9 月 3 日），胡觉已死。由此，可断定，胡觉必在 9 月 3 日之前不数日亡故。至于具体哪一天，则有待进一步查考。

胡传的五弟胡守璐，系唯一在《宗谱》修成后去世的胡适的叔父，此人在胡适家书中一直被称作“七叔”。既然是五弟，何以被称作“七叔”？其实，这种排行都是堂兄弟排序的。胡传有一位堂兄胡瑀（以胡适三兄振之为嗣子），一位堂弟胡守瑜（胡适与其子嗣林往还甚多），加上胡传兄弟五人，所以排行最小的称作“七叔”。这就足见世系表中列出胡适的堂伯父、堂叔父的重要性了。不然读

者不明白为什么“五叔”却被变为“七叔”了。《宗谱》记胡适这位“七叔”的生年甚明了：生咸丰丙辰正月初一。其卒年，为1915年7月20日，此据1915年8月28日胡母谕胡适：“尔七叔父自阳历六月以来，即已患病，徧【遍】身发黄，大约因平生沉湎于酒之故。所有各项病状，予第六号函中经已略述，其后日渐沉笃，竟于七月二十号申刻撒手长逝，尔父辈至此遂无人，良可悲惋。”

至于本文一再强调，人物的生卒时间尽量细化到月日，也有意义。比如，我们查核胡传兄弟五人（《宗谱》所录者）的出生日期，全部在阴历的正月、二月。这又为何？胡传在其《钝夫年谱》里说，他家以贩茶为业，其父平常在川沙经营茶铺，“而每岁之春必归里采办各山春茶”。也就是说，只有此时，夫妇方能同房，妻子才有机会怀妊，怀胎十月分娩，恰是次年正月、二月。

要之，尽可能翔实地胪列胡适近亲人物的信息，考实其生卒年月日，对胡适研究而言，是极重要的。

李敖这样的游士在台湾，恰是旧文明毁灭的标志

富察

李敖余光中这批中原人的陆续辞世，意味着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亦即事实上的南朝）和母体的瓜蒂已经自然断落。比他们小二十



“富察”李延贺

岁左右的中原一代目前虽然活跃，也拥有一定的媒体和文化能量，心中最为唏嘘不已，悲凉万分。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是面临假如王师南下时的尴尬身份。

很多人提及早年启蒙于李敖大师的故事。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虽然他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台湾接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继续反传统，拥抱西化。然而骨子裡他一直具有某种中国传统文人的特质，才子风流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则是机智圆熟的无根游士，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他被视为大师，恰恰是不出产思想家、而盛产游士的中华土壤之果实；他能够影响一两代人，反过来说明今日的华夏世界在思想方面依旧不可救药的孱弱和苍白；他是民主自由的启蒙家，凸显了华夏世界古老专制威权传统的厚重和凝固。他的有名，实际上和电视大众媒体的兴起有关，而电视更洞见了他是媒体人而非思想或文化大师的本质。

我在仁爱圆环他家附近的一家店裡，看到他穿着招牌红色外套，也真的亮出瑞士小刀和一叠台币后，我在康熙来了看他和女主持人过招后，更加理解他的新时代媒体属性。如果他年轻四十岁，他一定是网红无疑。

按照刘仲敬的说法，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生态位置。李敖在台湾，扮演的是日治时代已经积累出的土豪社会，在土崩瓦解的同时，游士突然占据了舞台的中心。「游士的存在是旧文明毁灭

的标誌，但不是原因。他们没有再造文明的能力，却一再高估自己的重要性。」

对于已经去世的人，上述这些看法并非不敬。反而，为尊者讳的糟糕传统会製造出虚假而伟大的祖先偶像。

关于李敖，我的另外一个看法，是出自我的满洲视角之所见。

大致说来，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的东北人约略分为汉系和满系，在台湾都各自有非常知名的代表。李敖算是汉系东北人，他爷爷是山东贫苦的移民，晚清之际闯关东，来到被迫开放汉人移民的满洲之地。到他父亲李鼎彝一代才改变家境，有机会由公费支持读北大中文系（李敖的儿子也读北大）。而李敖本人则出生满洲国时代，小时候的照片也是一副日本孩童打扮。

胡茵梦则是满系东北人（满系东北人这个词不準確，因为从满洲看，本无东北人的地理概念），出身于沈阳的正红旗贵族世家。然而在晚清的东北，伴随着李敖家族的经济崛起，传统旗人贵族家庭则大多是没落。即便如此，胡茵梦父亲胡赓年依托于远方亲族的满洲国大臣臧式毅，依旧有机会留学日本。

这两个人的故事，其前传本来是满汉两个族群在东亚近代史大变迁下各自有其轨迹的生命史，然而最后，他们的家族都在战后随着国民党体系从满洲大地出发，辗转落脚台中。

二人的相遇和分离，也是满洲正红旗瓜尔佳氏贵族后代和闯关东的山东土匪农夫后代，在海峡一端之岛屿上的错误邂逅。这样的故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并不罕见。停车暂借问，白玫瑰与红玫瑰。然而东京帝大毕业的胡赓年的女儿，和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日据汪精卫政府工作的李鼎彝的儿子之间，并不算是倾城之恋，只能算作一方不小心堕入凡尘。即遍如此，胡茵梦也少做辩解，坦荡而智慧。承袭了她的满洲祖母的风格，被人误解冤枉，也不用到处解释或以牙还牙，而是吞服鸦片而死，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从男女的角度看，这两人大致对应了贾宝玉的性别论。空灵的气质，自由的心灵，从容的仪态，对应了尘世裡的凡俗，确实有才智但也卖弄机智的无根游士。嬉笑怒骂的人生，他的心灵真的自由吗？就像他的思想是否自由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记一个自由主义的奉行者——李敖

李敖，他自诩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独行自傲，时而出惊人之语；行奇异之举。他蹲过黑牢，选过总统，做过立法委员。如今，他已七十四岁，一生传奇到此也进入尾声，他活得比蒋介石久、比蒋经国久，看尽蒋家楼起楼塌，竟也有《桃花扇·余韵》的唏嘘。然而常人看李敖一为尊敬他的博学，一为又想看他笑话，眼看他大闹立法院，眼看他在「语妙天下」（电视节目）中嬉笑怒骂，却鲜少有人能够从书中了解真正的他，一个自由主义的奉行者。

犹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临刑前疾呼：「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蒋介石的自由就是假的自由、罪恶的自由，那时的台湾没有真自由，有的是只是独裁者的王朝。从大陆到台湾，蒋介石一生摇摆不定，他只信仰权力，一旦触了底线，哪里还在乎自由主义，《自由中国》的忠言只道是共产主义一般的洪水猛兽，他办不了胡适，胡适名气太大了，于是雷震就这样不明不白入了狱，雷震如何会想到？他也曾是国民党的高官，

《自由中国》的创办也曾为蒋介石的首肯，可是「瑞元无赖」岂是浪得虚名？然而李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以言行去奉行他所坚持自由（Liberalism），有了雷震、殷海光的前鉴，他仍敢挑战当局的权威，蹲了两次黑牢却从不被击倒。也许是北大父亲李鼎彝的真传，五四的精神、上一代的播种在李敖身上绽放，多少人谄谀趋奉，可是李敖



雷震

(1897-1979)

不愿意，因为他是李敖。

李敖写道：「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这话自是夸口，可是当时的我却坚信不疑，又或者说，如今我会读史学系，李敖的影响也是一部分。读过《传统下的独白》，



殷海光

(1919-1969)

我完全相信胡茵梦曾把这本书插在牛仔裤口袋，招摇走过辅大校园。随着年纪日增，李敖对我已不是当年那个高不可攀的偶像了，对于他的诸多论点我也觉得有可议之处，但是李敖却依然故我，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李敖老了，可是仍充满活力，数年前的北京行，他给胡适立了铜像，胡适的精神他继承，可是他之后呢？没有了，他是最后一个。找不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形容李敖，只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可以隐然代表他一生所恪守的自由。

李敖：不老的狂徒

刘周岩

李敖去世的消息传来，许多人都感到惊讶，虽然去年6月份，李敖已经对外公布一封亲笔信，其中提到自己罹患脑瘤，身体变得像一个战场，“我很痛苦，好像地狱离我并不远了”。甚至许多人对李敖已经83岁的事实也感到惊讶，他仿佛未曾衰老，上一秒留在我们心中的印象还是那个身着红夹克、蓝墨镜，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斗士”。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见过一个老态龙钟的李敖，他仿佛还会忽然出现在“立法会”上，出其不意拿出一瓶催泪瓦斯，他仿佛还会出现在北大的讲台上，让台下的校长、党委书记边听边擦汗。



穿红夹克的李敖

1935年出生的李敖确实已经83岁了。他出生的前一年，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在哈尔滨出生的李敖一生下来就变成了伪满洲国的“遗民”。少年时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1949年14岁的李敖随家人移居台湾。此后他又完整经历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岛内的政治变迁。他不仅是一个“民主化”时期台湾政坛活跃的参与者，他自己就是见证台湾政治制度变迁的活化石。

李敖在两岸激起的波澜范围之广、牵扯之多也几乎无能出其右者。他一生所坚持的价值理想人所共知：自由民主、中国统一。有所坚持，就有所对抗，李敖和他的敌人们斗争的时候，也自然吸引来各路“敌人的敌人”企图与他为盟。早年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党外人士一度奉其为老大哥，甚至有台独分子擅自将李敖的照片印在杂志上，企望让这位扛起反对国民党大旗的斗士成为自己的图腾之一。晚年反对岛内独派势力，李敖又引起了大陆的极大兴趣。几次大陆之行引起了官方和民众足够的重视。大陆方面与李敖接触的幕后详情或许无从得知，但两个细节足以证明此种接触早已有之。李敖曾自述：“陈云林（注：曾任国台办主任）第一次来台湾，刘

长乐安排我和这位祖国大员有一次秘密见面。在夜幕低垂之时、在圆山饭店密室……陈云林笑着收下了我的赠书和‘抗议’，对我神秘一笑，我也神秘一笑。”李敖留在大陆的亲姐姐李珣则在文章中提到，1983年她从香港带回几本李敖的书，因为大陆正在“反精神污染”而被上海海关扣留审查。统战部非常热心地协调帮助，将书全部返还，因为早在此以前统战部就有意邀请李敖访问大陆。



李敖与冯沪祥

然而李敖最终未陷入某一派桎梏，不同的政治派别亦视其为“无法控制”，每每想利用李敖时倒反倒被其利用。这固然是因为他的

“滑”和机敏戏谑的处世风格，但背后更有他对自己独立性的坚持。

除了两个例外情况外，李敖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他也引以为傲。一次例外是 2000 年李敖为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而与新党合作，成为新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另一次例外是 2007 年宣布成立“中国智慧党”。不过据该党对外称，因为智慧党“拒收笨蛋”，所以现在该党只有两名党员，即建党元老李敖和其子李戡。

“外省人”李敖

李敖出生两年后，随全家移居北京。他在自传中写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家就住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直到 14 岁离开大陆前，李敖都主要生活在北京，这段少年时光成为他此后一生的基石。2005 年 70 岁的李敖再次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他动情地用一口北京话对着台下的师生说：“大家说乡音未改，我没改，可是你们改了，北京变大了。”对北大，李敖也颇动感情——他的父亲李鼎彝 1920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他的儿子李戡 2011 年从台湾高中毕业后入学北京大学。他自己虽未上北大，不过青年李敖在台湾的导师正是胡适、姚从吾等北大学者。

李敖认为自己对知识的兴趣和基础是在新鲜胡同小学和北京四中读书时打下的，迁居台湾入读台中一中后，李敖还颇多不满，“我总觉得我所经历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到高三时，李敖因厌倦台湾的教育干脆休学在家，而他父亲此时正是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只是对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李敖在大陆的日子不仅是他自己更看重的成长关键阶段，国家在那时也处于深重危难的历史时期，相互叠加，印象尤深。日后曾有大陆记者问李敖，为何在谈论



李敖小学毕业证书

大陆问题时用富国强兵、国家主义优先的思路，李敖回答：“我看日本军人骑着马在我眼前经过，你们没有这种亡国的感觉。”显然，如果大陆的年轻记者都缺少共鸣，李敖在台湾能有多少知音。

也更可以想象，怀抱着这种心情来到刚刚结束长达半世纪日本殖民的台湾，面对许多经历过“皇民化”而对殖民反思仍处在游移之中的台湾人，青年李敖将会产生怎样的不适感。

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开始，以“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为主要区分的族群问题就成为了台湾政治的核心议题。国民党威权统治结束、台湾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后，族群问题以新的形式和内涵愈发成为许多争论与冲突背后的内在逻辑。无论从经历、立场还是气质，李敖都是彻底的“外省人”。这一重关键的身份，成为理解岛内许多人对李敖的复杂情绪以及李敖自我认知的钥匙。李敖曾明确地说：“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在厄尔巴岛上，在圣赫勒拿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又说自己“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

1961年，26岁的李敖已经从台湾大学毕业、参军归来，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在《文星》杂志上发表的《老年人和棒子》让人们认识到了他非凡的才气，这其中既有思想上的敏锐亦有语言上的天

分。随后是有接续新文化运动时期论争意味的“中西文化论战”的开展，李敖站在“全盘西化”一派，对许多鼓吹传统中国文化的学人和其背后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攻势，反对威权统治，要求言论自由，倡导自由主义。他以文为生和“骂人”的生涯即是从此时开始的。许多学者直到今日都把李敖在六十年代文坛的活动视作他一生最主要的成绩，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众多杂文为他奠定了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得以进入胡适、殷海光这一脉落下的“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列。

很快，论战的另一重“成果”到了。四年后，《文星》被查封。李敖也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盯防对象。因为批评政府的尺度越来越大，加之与彭明敏等人的交往，李敖终于在1971年被捕入狱，判刑十年，实际服刑5年零8个月。这段“国民党黑牢”生涯被李敖日



我与《文星杂志》

后不断提起，成为他“斗士”形象的一个主要支持依据。

不老的斗士，亦或堂吉诃德？

“我发现，李敖写剧本的能力，远远超过他写小说的能力，因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进入表演状态，他往往能够出人意料”，这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对李敖作品的“点评”。“表演”是很多人对李敖的认识，甚至有人不客气地将他称为“表演艺术家”。

喜欢李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有。夸张、自负、刻薄的风格以及有时并不高雅的语言是引起反感的一种原因。在这些李敖的批评者看来，他就像一个演员，红夹克、墨镜都是他的“戏服”，随身还携带着面具、催泪瓦斯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道具。李敖仿佛具备一种能力，把所到之处都变成他的舞台。

风格学上的争论只是表面的，为李敖做出的辩护也早为人所知：李敖在台湾是孤独的，他的声音既然势单力薄，不得不以“出格”方式引人注意。李敖自己的表述是：“我吹牛，因为你沉默”。另一重解释是，这是李敖幽默感的体现，而幽默感恰恰是中国人所稀缺的一种品质。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曾讲过一个故事，他带着三

联书店两位年轻同事去台北拜访李敖，李敖问他们是否已经去过了台北故宫。两人说昨天去过了，李敖便说，那你们明天可以打道回府了，因为台湾一共两件国宝，一件是故宫，另一件就是我。“根据这样的话，能说李敖狂妄吗？这就是一个玩笑，表露他的顽童性格”，李昕说。

对李敖态度分野的更深层疑惑是，李敖晚年的斗争是否还有意义？李敖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言论自由作为诉求，那么在1987年台湾解严，开放报禁、党禁，开始所谓“民主政治”，台湾社会享有充分言论自由并实现不同政党轮替之后，李敖还在抗争什么？

2000年，李敖出人意料地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与连战、陈水扁、宋楚瑜、许信良共同成为五位候选人之一。他明确表示，主要的政见就是反“台独”、与中共进行“一国两制”谈判。作为“搅局者”，李敖自知没有机会胜选，意在宣传他观点而已。“我参选的功劳就是把这个问题丢出来。台湾二千一百三十万人，可能只有我李敖敢公开赞成‘一国两制’，其他人可能心里赞成，但是

也不敢讲。”参选时李敖也没有忘记他的幽默感，被记者问到“副总统”候选人找谁，李敖表示歌星张惠妹很合适，“万一我被干掉，台湾就整天唱歌就好了。欢乐满宝岛，让台湾恢复到四百年前最原始的模样。张惠妹的歌声可以直指人心，又是真正能够征服大陆的人。”

2004年，李敖再度亲身参与政治，宣布参选台湾“立法委员”。他自有一套抓住媒体的方式，媒体也乐得他再来搅局。李敖先是宣布做“立法委员”陈文茜的助理，就军购问题发表声明，题目为《二千三百万，别再做笨蛋》。自此，“立法院”选举便因李敖的加入而好戏连台。当年12月，李敖正式登出竞选广告，开篇写道：

活在过去，心里发毛。活到现在，鬼哭狼嚎。

活在明天，风雨飘摇。活在台湾，无处可逃。

我很气闷，我很低潮。我很想骂，我睡不着。

连台歹戏，我不想瞧。我找杀手，我选李敖。

多少有点意外地，李敖竟成功当选为225名“立法委员”之一，尽管是他所在选区票数最后一名。李敖兴奋异常，“参加这种议会

就是要搞垮它！”

李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起诉除他之外所有其他 224 名“立法委员”。原因是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文抗议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吁北京三思”。李敖起诉的理由也很简单，他并不反对这一法案，“立法院”无权代表他，他要求 224 名被告每人赔他一块钱。此



后李敖几次“大

被告大丰收

闹立法院”，无论手段怎样惹人注意，其主旨都是宣传他反“台独”、反军购、支持“一国两制”谈判的立场。

日本著名台湾政治史学者若林正文曾概括性地描述战后台湾政

治的变迁，“一言以蔽之即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化’”。换言之，所谓“民主化”进程与“台湾化”进程相伴相生，一体两面。当台湾终于“民主”后，它也“去中国化”了，这是抛弃国民党旧有政治格局所带来的双重作用。可李敖追求的不仅是自由与民主，他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前半生不得“自由”，后半生不得“中国”，这是李敖毕生不懈战斗的动因。无论他的“表演”引起多少注意，在今日台湾政坛的情形下，李敖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自由中国”，这是李敖的导师胡适等人创办的杂志的名字，也是他未竟的理想。

若林正丈还把近代以来台湾的历史做了概括，即分别作为三个不同帝国的边陲的存在，这三个帝国是：满清、日本、美国。满怀家国情怀的李敖对这三个帝国全无好感。所以当许信良问李敖如何在台湾定位自己时，他回答：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和民进党前主席聊政治

张悦

往茶几上放录音笔的时候，我不小心把茶杯打到地上，身旁这位 72 岁的民进党前主席迅疾俯身弯腰捡起茶杯，放回桌上，另一只手礼貌地横在我眼前，示意他捡就可以了，“不要紧，无所谓的。”他是许信良先生，台湾政坛中一个最百折不挠的失败者。

前些年，为了看台湾台，家里特地安了卫星电视，我对许信良并不陌生，对他失败者的形象也已习以为常。在政治民主、选战激烈的台湾，政见会动辄电视直播，各台名嘴的板砖和吐槽也同步跟进。许信良毫无优势可言：他长得不好，小蒋以降，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形象都还算过得去，到马英九这届，女性选民更是“小马哥”的票仓；他口才不好，有点结巴，2011 年那场民进党台湾地区领导人政策发表会上，3 位候选人中苏贞昌台风稳健，蔡英文知性犀利，唯独许信良老态难掩频频低头看稿；他身段不好，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居然先后不见容于蓝绿两党。

但在生活中他是个可以放下身段为你捡杯子的人。“不忘初心，”他说，无论是突承大统的李登辉、一心想赚钱的穷孩子陈水扁，还是因缘际会由学入仕的富家女蔡英文，“他们都和我不一样，他们是没有初心的。”

自从小学三年纪接触到堂哥一堆历史演义书籍起，他博览群书，不断汲取书中自认为有关“英雄本色”的精华，“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我都会背的，将星陨落五丈原，我难过得要死。”

他后来有机会去大陆追寻



许信良

诸葛亮的五丈原，又曾沿着“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路线重走一遍。他一度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的一句“今后可能没有英雄，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倍感失落。

许信良的英雄梦是他屡战屡败百折不挠的一个注脚：他曾是国民党刻意培养的青年本土干部，却因返乡参选桃园县长而被开除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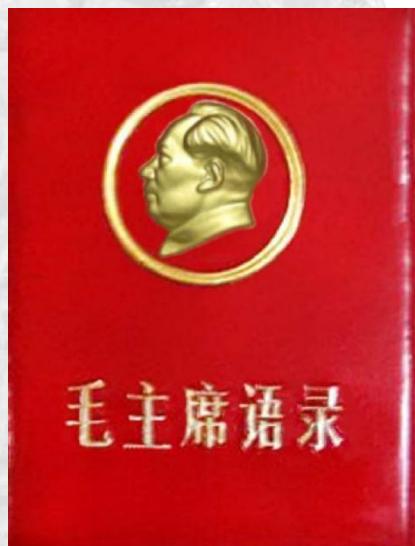
籍。作为台湾民主先行者，他为民进党立下战功，但由于提出了大胆西进与大陆建立全面合作关系，这在当时过于前卫，被得势的基本教义派诬为卖台小人，1994年大选党内初选败在台独大佬彭明敏手里。2000年大选，他又在讲力不讲理的民进党候选人争夺战中败给陈水扁，一意孤行的许信良脱党参选，最终只得到不到1%的票选。2004年他倒戈为连战助选，为“两颗子弹”在“总统府”前绝食。2008年，在民进党败选后，许信良应邀重返民进党，担任顾问。2011年，年逾古稀的许信良在最后关头参与角逐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一定要在自己政治生涯的暮年，再干一次“一生想干的事情”，又一次毫无悬念地失败。

许信良是台湾政坛独一无二的在蓝绿两党均二进二出的奇绝人物，也因此谤讥于市朝。近10多年，许信良频频往大陆跑，参加各种类型的两岸关系研讨会，并成为北京领导人的座上客。为此，曾有民进党人质疑，许信良重返民进党，是要做国共两党的“卧底”。

张悦：我知道你是民进党交流派，是这个派别的旗帜性人物，是民进党中央和大陆关系最好的人，你还去过延安、邓小平的老家广

安，还有井冈山等很多台湾人很少涉足的地方。你这个交流不是表面上的那种去北京的交流，走得很深入。这些游历的经历到底给你的思想和行动带来什么东西？

许信良：因为我读政治，我本身又是政治狂热者，中共的革命史我本来就当作中国的现代史这样去关心，一直高度感兴趣的。我读台湾大学的时候，这些都是禁书，都不能看。后来我在英国读书，就看毛选，跟中国革命有关的东西，我在英国读哲学，却读了很多中共的东西。而且那个年代，1960、1970年代，在英国，在欧洲，全世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那些运动中，当时毛主席的红小册（红宝书）在全世界都很流行。他们不见得真的了解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毛主席语录的某些话就变成一众当时学生运动崇拜的教条，你可以这样讲，真的是他们的教条。所以我当然对中国共产党特别



“红宝书”

有兴趣，中共革命重要历史和地点我都去看。

张悦：李敖对中国历史和中共革命的了解应该不亚于你，但他前几年“登陆”之前，一直标榜自己读万卷书但不用行万里路，你为什么要追寻中共的这些革命遗迹？



井冈山

许信良：最重要的是你看这个地方有什么感想，这个地方你有真实感嘛。像井冈山，他们怎么能在那里存在发展一段时

间？你看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路程，你也更能体会，从前李自成是怎么革命的，黄巢，历程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历史上那些农民革命是怎么样发展的。你光读那什么资治通鉴这类书，你不能想象，但你读中国共产党革命，你看中国共产党历史景点，你看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艰辛，就更了解他们为什么能成功。毛泽东政治（上）的厉害。他搞土改，搞阶级斗争，搞政治工作。古代农民革命领导者

没有这种强烈和清楚的政治工作意识，共产党完全知道，（所以）它不会垮掉，不会失败。这样走过就更了解。我个人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是有高度的尊敬的。

张悦：你作为民进党第一代的领袖，用这种眼光看待共产党的革命史会出乎很多人的想象。

许信良：当时共产党第一代革命者，你们也把毛泽东三七开，他确实有很多缺点，那是整个一代人的革命情怀，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但我们台湾的革命者，因为时间太短了，没有时间建立一个政党，我们都是争民主，要还政于民，我们也不能建立一个军队，建立一个政党机器去掌握政权。时间太短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真正的成熟的政党。

张悦：你的意思是民进党没有一个充足而递进的发展时间和步骤，很快就开放党禁了，反而不是好事，也让台湾的民主没有时间充分培育。

许信良：因为我们太快成功，开放民主，就是搞人民选举，但没有办法改变人民。台湾现在就是人民的水平决定（选出）怎么样

的领导人。

张悦：民主并不一定能投出一个真正好的人。

许信良：我们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你看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对民主是极度地怀疑。古代希腊是真正的民主。

张悦：可就是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

许信良：对，他认为民主就是暴民。希腊的民主是一两万人的民主，现场的演讲，小城邦的民主，所以很容易成为煽动家可以操纵的民主。台湾的今天，某种意义上呢，其实很接近这样一个社会，就是彻底的自由。但这自由其实也是煽动家可以影响的。但是马英九、陈水扁是煽动家吗？也不是。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台湾现在有公民社会，可为什么政治领导品质这么差劲，这么糟糕？为什么会选无能的马英九，为什么会选择陈水扁我们认为这类二三流人物，人民为什么选择他？这个民主，这个人民投票只是说反映这个时代台湾政治文化整体水平。

张悦：才到这个阶段。

许信良：对。我们读政治的人，不能怀疑民主啊，我们一生追

求，我们内心里面认为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读政治学的都知道，好多思想家批评这个民主，可是其实没有更好的制度人类实验几千年的结果，确实如此，所以有一种信仰，虽然现在对我们不利，这个民主会进步，人民整体水平是会提高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这样相信。

张悦：1990年代初你很早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大胆西进”的理念（1991年初，许信良通过日本社民党元老田英夫联系安排，取道大阪、密访北京——观察者网注），我觉得许主席你是一个聪明人，会对党内外情势有一个判断，可你提出这样一个超前的东西，去坚持它，让自己输掉了一个获得当台湾领导人的机会，值得吗？

许信良：对，你这个问得好。我自己也曾经反思，那个时候我也知道这个主张对个人很不利，很致命的。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我个性上的缺点。虽然是政治人物，我一生把这个当职业，但无法改变个性上的缺点，我想得很简单：如果你想成为台湾领导者，你不能面对台湾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整体看法，那你当领导干什么，你寻求权力干什么。

1990 年代以后，我认为民主基本上完成了，剩下就是怎么深化、怎么优质化的问题。那是技术问题。很可惜，现在并没有做得很好。也许我乐观得太早。但 1990 年代，李登辉已经提出很多戒急用忍、限制台湾企业家和大陆接触这样的政策，他有强烈的把台湾抛离大陆的想法，长期以来台湾国民党就是从两蒋到李登辉都是这样，一直到 90 年代还是这个思维，我就觉得台湾政治领袖一定要改变思维。两岸关系对台湾是最重要的关系。你不要说为别的，就说为经济发展，台湾经济怎么地区繁荣。我当时



李登辉

(1923-2020)

觉得这个问题已经是很具体迫切的问题。你想成为台湾领导者，你不能不触碰这个问题，不能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张悦：政治家难道不应该更讲策略吗？

许信良：是的，是的，没有错，我同意。但是你自己怎么想，作为政治人物你自己怎么想，这个不能有策略，你晓得我意思吧。是不是？这就是作为政治人物，我个人的缺点。

张悦：那么你怎么看待李登辉呢？你回到台湾后被判10年，他曾经把你从狱中特赦出来。

许信良：李登辉先生我认为他一生非常矛盾，他很幸运，成为台湾领导人，纯粹是人生幸运。我相信他都没有想到。李登辉这个人是学者，他真的是一个学者。他年轻时候，他是共产党员，是左派。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他也是曾经受过世界政治思潮深深影响的人。在国民党里我认为他是很好的政治领袖。但这个人一生充满着矛盾跟复杂。他对台湾和大陆问题，他对台湾定位是有一种自己的、有别于国民党的定位。他也找很多学者研究，后来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目的不见得是想挑战大陆。

张悦：这也许更符合李登辉的真实逻辑，但我认为他意识形态的成见也很严重。

许信良：他对中国有没有一种潜在的、受日本教育的敌意，我

认为也存在，在他的内心深处。所以李登辉，从权力来讲，他是一个成功的，也是非常有手腕的领导者。可作为精英学者他提出戒急用忍，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在这里。意识形态使得他判断错误。我觉得他对 80 年代、90 年代以后和平地转移到民主社会有他个人的贡献。假定当时不是他当台湾领导人，我真的这么认为，这个是天命，如果是别人，任何一个人成为国家领导者，就可能不能和平过渡到民主了。第二个，他退休以后，特别强调台独，变成很激烈的台独主义者，我认为他想洗刷他，他侥幸成为领导者那样一种遗憾。

张悦：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旗帜人物，留下政治遗产。

许信良：对。完全正确，他退休以后一直想把自己定位为、塑造成一个台独教父，那个心理和毛主席晚年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旗手完全一样。

张悦：你在蓝绿两党可以说是两进两出。你不太善于迎合主流，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却使自己被孤立。其实你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央社”是当记者的，你这样的性格，为什么就不能去简单地做一个记者、学者，而非要介入复杂的政治呢？

许信良：我志不在成为记者也不在成为学者，这不是我从小的理想。我生在毛主席那个时代，我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成为跟他们一起搞革命的人，一定是这样做的。一定会加入那个运动。

张悦：为什么不是国民党，国民党曾经也是革命派，北伐的时候，黄埔军校那会儿。

许信良：这个还是跟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有关。我是从来都认为，一直希望民进党除了民主以外，主张社会的公平，就像西欧那种社会福利政策。我一直强烈主张社会福利，推动一些政策，可是很多没有办法实现。这是民进党这一代的不幸，党还没有（真正）建立就执政，人民选举就成为执政党。执政太容易，简单讲就是光讲民主跟本土议题你就赢了，所以不求上进。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李敖之父在营城新证

朱万里



李鼎彝

(1899-1955)

以前发贴介绍过李敖之父曾在营城任过职，根据只有李敖回忆文章中提到的几句话，说他父亲李鼎彝在东北营城子煤矿当过总务处处长，其间认识了台湾人翁镇。而对于李敖之父任职过的这个营城煤矿是不是我们的家乡营城煤矿（因为东北叫营城子的地方很多）、李敖之父在营城任的什么职、翁镇又是干什么的等问题，还缺少史料的支撑。

最近得到一些资料，对李敖的父亲在我们家乡营城的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肯定并有了新的补充。

先看李敖的自述。李敖在《李敖快意思仇录·陆根纪》中说：“爸爸靠舅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

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小名季恒，字玑衡，一八九九年生。李敖大事年表中记载：1945年，李敖10岁，暑假后小学四年级，……李鼎彝在东北营城子煤矿任总务处长。

营城煤矿是由原营城煤矿、新东煤矿、隆吉煤矿和裕东煤矿合并而成的（参见本吧“营城老矿溯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专门在营城成立了接收委员会，负责上述煤矿的接收重建工作。该接收委员会的地位很高，直接归翁文灏为委员长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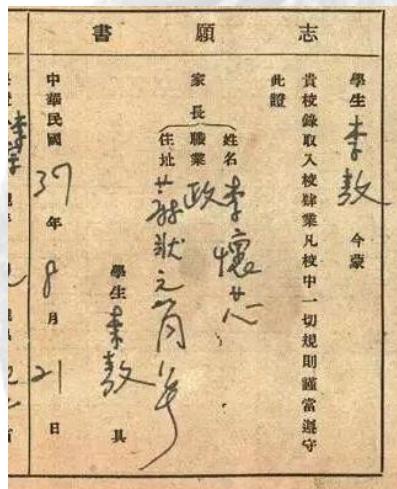
在新近得到的家乡的资料中，查到了当时营城的接收委员会（主任为孙炜鄂）确实设有总务处，总务处设主任一名，叫李怀芯，而不叫李鼎彝；接收委员会下属的原营城煤矿以及各矿均设有总务科或矿务课，但这些部门也都没有叫李鼎彝的。李鼎彝究竟到哪去了呢？还是李敖的作品提供了线索。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委蜕记》中说，父亲在“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这就是说，李敖之父李鼎彝在营城时用的是化名。

那么，李鼎彝的化名叫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接收委员会总务处主任李怀芯呢？答案是很肯定的。

据《财经时报》2005年9月24日报道，李敖在2005年的神州之旅中，母校北京四中领导亲自将李敖的中学学籍簿赠送给李敖。记者看到学籍簿照片显示：“学生‘李敖’今蒙贵校录取入校肄业，凡校中一切规则谨当遵守，此证。家长：姓名‘李怀芯’，职业‘政’，住址‘麻状元胡同八号’，学生‘李敖’具，中华民国37年8月21日。”。

这张学籍簿证明了李敖之父为李怀芯，也就是李鼎彝。所以，李敖之父所在的营城就是我们的家乡，其准确的任职是接收委员会的“总务处主任”，而不是营城煤矿“总务处长”。同时，李怀芯（李鼎彝）还是营城的隆吉煤矿（属商营）的董事。



家长署名“李怀芯”

再看李怀芯（李鼎彝）与翁镇的关系。资料记载，翁镇当时是营城接收委员会下属的隆吉煤矿的矿长兼矿务科长。李鼎彝与翁镇在总务口是上下级关系，因此，李鼎彝能为翁镇提供帮助，翁镇自然会表示感谢，并给李鼎彝留下了在台湾的地址。这也是李敖一家“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

可以说，在营城认识了翁镇，对李敖一家去台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没有李怀芯（李鼎彝）在营城的经历，世界上也就很难有特立独行的李敖了。

李敖大事年表中所载，李怀芯（李鼎彝）1945年任营城总务处

长似不确切。因为李怀芯（李鼎彝）是在国民党政权的接收委员会中任总务处主任的，事实上，国民党军队是在 1946 年 6 月才进入营城的，先是由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派袁执枚上校充任营城煤矿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个月之后，改由胡浪阁上校充当主任委员，同年 10 月又由九台县梁县长兼任主任委员。1947 年 2 月 1 日由资源委员会东北办事处吉长分处处长孙炜鄂接任，组成接收委员会。李怀芯（李鼎彝）是何时进入营城的，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如果李怀芯（李鼎彝） 1945 年任营城总务处长，则可能先在民主政府中任的职，因为九台县民主政府是 1945 年 11 月成立并接管矿权的。从 1945 年到 1947 年，营城几度易手。资料表明 1947 年营城解放前，李怀芯（李鼎彝）仍担任总务处主任这一职务。1947 年 10 月 17 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次解放营城，李怀芯（李鼎彝）大概是这时离开营城的。李敖大事年表中只记载了“1948 年，13 岁，……时国共之争，北京危急，李鼎彝决定分批南下避乱。”李怀芯（李鼎彝）离开营城的具体时间不详。

作者： 改河之子 2006-4-15

2 李敖之父在营城新证

还有一点，李敖来过营城吗？

李怀芯（李鼎彝）在营城期间，李敖一直在北京读书，没有随父亲到营城居住。这期间李敖有没有在假期到营城探望过父亲呢？李敖自己没提到，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父亲，李敖有过这样的回忆：“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 1899 年（民国前十二年），1899 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 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



少儿李敖

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 1926 年（民国十五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其后，李鼎彝先后在北京、太原等地谋生，抗战后到了营城，其后回到北京，又滞留过上海，最后带家人去了台湾，1955 年 4 月 27 日病故。

我们从李鼎彝以及翁镇等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营城煤矿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作为资源重地，都曾被高度重视，都曾吸纳过大批人才。

下面附上营城 1947 年的接收委员会主要成员名单。不知道这些人的政治结论如何，这里只作为历史资料提供出来。街石老师曾介绍说翁镇有一男在营矿三中任教，八十年代去了齐台河煤矿。还有人知道这些人是否有后人留在营城吗？

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孙炜鄂

副主任委员：徐广裕

秘书处主任：杨颐龄

总务处主任：李怀芯 ☆（李敖之父李鼎彝）

会计处主任：鲁吉士

工务处副主任：关景禄 吕明义

机电处主任：陈世昌

职工处主任：耿心泉

业务处副主任：杨明岐

文书课课长：贾春祥

出纳课课长：孙赞侯

教育课课长：孙赞侯（兼）

警务课课长：池文恒

帐务课课长：旋介毅

成木课课长：鲁吉士（兼）

土木课课长：周纯义

计划课课长：吴翥轩

电务课课长：沙安成

人事课课长：高纪云

组训课副课长：金得功

福利课课长：关敏园

营运课课长：杨明歧（兼）

材料课副课长：沙荫椿

员工子弟小学校长：陈德山

医院医务长：谢允谦

各矿主要成员：营城煤矿矿长关景禄；新东煤矿矿长孟昭荣；隆吉煤矿董事长孙炜鄂，副董事长程永祥，董事徐广裕、李怀芯、王新风，监查卢吉事，矿长翁镇（兼矿务科科长）；裕东煤矿矿长穆宜生，副矿长秦梦乾。各矿科室成员略。

另附接收委员会成员名录节选扫描图，是为实证。

1 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妹人、后来任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桢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



张莘夫

(1898-1946)

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国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老爷孙律坡介绍，

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作者： 改河之子

2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附李敖大事年表节选

1935 年

4月 25 日，生于哈尔滨，时日本占领东北，在日操纵下，溥仪立“满洲国”，成傀儡王。父亲李鼎彝自 1926 年北大毕业后，任吉林六中校长，为了生计，又任教于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等校。他与吴焕章等人组织黑龙江青年抗敌会，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理事，进行地下抗日活动。

1937 年

2岁 为免遇难，李鼎彝举家逃至北京，数次搬迁后，住内务部胡同甲四十号。不久，“七七事变”，国民党弃城而去，日本占领北京。经地下组织同意，李鼎彝入北京



幼儿李敖

汪精卫政府法部任科员，并负责北京地区地下抗日协会工作。

1940 年

5岁 李鼎彝任太原市禁烟局长。5月随父赴太原，游太谷等地。
并在性格上受到耿直的男佣温茂林影响。

1941 年

6岁 得盲肠炎，住北平东华医院。受伪政府内部争斗的牵连，
李鼎彝以“贪污罪”被日军逮捕，六个月后无罪释放。李辞职回北
京闲居。

1945 年

10岁 抗日战争胜利。暑假后小学四年级，因日本投降，停学
日语。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李鼎彝在东北营城子煤矿任总
务处长。

1946 年

11岁 新鲜胡同小学改为一区九保国民学校。7月初小毕业。
暑假后入高小五年级。已读到《黑奴魂》等翻译小说。

作者： 改河之子

3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有点意思哈

作者：太子阿丹

4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1937年因不愿生活在日本伪满州国，李敖全家从东北迁往北京，住在当时的东城内务部街甲44号。

7岁进入北京市新鲜胡同小学读书。

小学六年开始向北京的《好国民》杂志投稿，刊出了《妄心》和《人类的冷藏》等文章，这是李敖发表文章的开始。

作者：街石

5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文中翁氏有一男在营矿三中任教，八十年代去了齐台河煤矿。不知近况。

作者： 222.63.40.*

6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楼上对家乡的掌故了解得真多，翁氏之子的事还真是很少人知道，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这也是李敖文中提到的那些事的最好佐证，令人兴奋。

作者： 改河之子

7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把老帖子顶起来。

作者： fanyibai

8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我靠

有这事儿??

真不容易

作者： 221. 9. 77. *

9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楼上好，这事是真的，我另一贴有过证明。

作者： 改河之子

10 回复：李敖的爸爸当过营城煤矿的总务长——摘自李敖《快意恩仇录》

5 楼所提及的翁老师，是否 80 年代初期开始在教育科工作（主要叫函授生）？

作者： 68. 190. 220. *

没有李敖以后的国民党

费文侯

如今李敖去世，小妹大等媒体人和当年的李敖一样，仅存剩余价值。第二次失去政权的国民党，还有哪些李敖般的党外可以利用，小妹大这种人才能够吸纳呢？

曾红极一时的李敖 82 岁过世，在年轻一辈中知名度不高，要怎么向年轻人介绍他？也许可以这样说：假如李敖生在当今的网路时代，他会是走政治路线，高人气又高争议的网红。

资讯普及不比现在，又是政治戒严的时代，李敖就能靠着有限的通路以文字大鸣大放，一如现代发表一则影片就有几十万点阅的网红。那时只有国民党，或是不属于国民党的「党外」，若以立场区分，成天痛骂国民党，还被关进监狱坐牢的李敖自然是无可质疑的党外。

李敖标榜自由民主，生产大量批判威权体制的文字，在戒严时期影响力不小，李敖对于这个时候的国民党，是难缠的敌人。假如

能够只颁给年轻李敖褒扬令，想必没什么人会有意见。

问题是，李敖一辈子最辉煌的火花，好像都是和国民党摩擦所造成。在国民党势头最盛的时候，李敖的火花也最灿烂。解严，渐渐不再是国民党一党独大以后，李敖的光环也慢慢跟着消逝。等到国民党失去中央政权，李敖仿佛也已燃烧殆尽。

再也创造不出什么的「李大师」，只能靠着过往累积的形象让各方消费，包括晚年的李敖自己，包括李敖的家人，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甚至是迫害过他的死敌国民党。

年轻的李敖，
不知道会如何批判
晚年放弃民主自由，向共产党示好，年轻的李敖怎么知道？
晚年放弃民主自由，向共产党示好的李敖？他也因此获得「晚节不保」的评价，让民进党政府的褒扬令显得有些尴尬。



尴尬的终究是李敖，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只有党与党外，只要不是国民党就算是党外，后来成立的民进党只是其中较大的一股杂牌军，所以李敖批判国民党的同时，既是党外，后来又反对支持台独的民进党，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李敖是统派，不支持台独的民进党不难理解，但统派



老蒋：“李敖，快说谢谢！”

是一种选择，选择本身不可耻，可耻的是，面对各方面都超越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李敖没有拿出年轻时批判国民党一样的标准，却选择了臣服。

没有国民党，李敖摩擦不出这么灿烂的火花，要讲尴尬，也没人比得上国民党。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又长又深，思考台湾政治若不考虑国民党，那是脱离现实，一点价值都没有。长期威权统治之下，创造了台湾政治特殊的「党外」群体，不论抱持什么价值观，

唯一共通点就是反国民党，李敖见证的就是那段统派独派手牵手，一起对抗国民党的奇妙时光。

在国民党第一次失去中央政权，总统换人做的年代，党又从党外吸纳了许多战力，成为8年后再起的重要养分，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李敖大哥大的好朋友：文茜小妹大。与为党马前卒的小妹大不同，曾经伤害大哥大的国民党，只需要前党外名人李敖三不五时嬉闹一下民进党，发挥剩余价值即可，渐渐干枯的李敖，也只能胜任这类工作了。

如今李敖去世，小妹大等媒体人和当年的李敖一样，仅存剩余价值。第二次失去政权的国民党，还有哪些李敖般的党外可以利用，小妹大这种人才能够吸纳呢？

老党外追忆似水年华：我曾与李敖、 郑南榕并肩作战

简立欣

昨天（7日）是民主斗士郑南榕逝世35周年纪念日，笔名史为鉴的「老党外」石文杰接受《梅花新闻网》专访，畅谈40年前，他和立场完全相左的李敖、郑南榕等人，竟然能在郑创立的《自由时代》底下并肩作战，只因当时的党外全心想要对抗专制和霸权，因此可以海纳百川。

郑南榕是1947年次、读台大哲学系，而石文杰是1950年次、读台大历史系，两人在校时并不认识，1984年郑南榕创刊《自由时代》周刊，但卖得不好，当时石文杰帮党外杂志写文章，对禁书很有研究，听别人讲起郑南榕，他主动跑去《自由时代》杂志社找郑，一聊才知道原来是同校毕业的学长。

初识郑南榕



石文杰、颜锦福、李敖、苦苓在李敖书房

石文杰说，他第一次见到郑南榕就是在现在北市民权东路三段的《自由时代》杂志社里，郑南榕一个人「校长兼撞钟」忙得要死，社内堆满了退回的杂志。两人相谈甚欢，郑南榕叫石文杰把台中教职辞掉，来台北帮他忙，但石文杰当时妻儿都在台中，且老师也好歹是个稳定工作，于是石文杰同意在每周《自由时代》截稿日搭国光号北上帮忙，郑南榕则负责车马费。

石文杰说，郑南榕创刊后的第一年春节来台中找2个朋友，一个一个是苦苓，另一个就是他。郑南榕一来就给石文杰两个小孩大红包，

比石文杰自己包得还多，意思是又要石辞职来台北帮他，石又没答应，郑南榕还笑骂他「你没 XX（男性生殖器）」，后来郑南榕找到胡慧玲当执行编辑。

石文杰说，他自己毕竟在学校任教，对时事没有郑南榕敏锐，觉得每周就是去《自由时代》白白吃郑南榕一个便当，很不好意思。后来他提议出版《自由时代》系列丛书，因为石文杰对禁书很有研究，郑南榕说好，而且后来几乎全权授权给他，该系列有 20 几本书，大概有 2/3 都是石文杰去找来出版并写序，而这个系列警总的查禁率是百分之百。当时出书真是百无禁忌，左右统独都有，石文杰说，因为郑南榕就是秉持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精神，兼容并蓄。

当时石文杰每周来台北一趟，周刊截稿时都半夜了，于是好几年的期间，石文杰常常在郑南榕家阁楼过夜，隔天早上郑南榕出门了，但郑南榕父母都在家，好客的郑爸郑妈总是一早就把早餐摆在石文杰床头。石文杰后来得知，郑爸郑木森是日据时期来台的福州人，在石文杰老家宜兰中兴纸厂当过剃头师傅，郑南榕名字里的「榕」就是福州，小学在宜兰就读，郑南榕常常跟同学打架，因为同学说

他是「阿山」（日据时期称外省人）的小孩。

赴港找书「荤素不忌」

1984年暑假，石文杰跟郑南榕说想去香港找书来出版，那时香港不能直接去，要从新加坡绕道过去，行前石文杰告诉郑南榕，他去新加坡、香港会见很多人，可能左右统独都有「荤素不忌」，郑南榕只是很干脆地说了一声：「why not？」

后来石还见了大陆官媒驻香港特派员，以及《明报》、《广角镜》



郑南榕

(1947-1989)

等港媒。回台后他跟郑南榕报告此行行程，两人还不敢在杂志社谈，怕被监听，跑去咖啡馆。

石文杰说，他跟郑南榕很常去咖啡馆吃简餐，也常常出租车一搭就去敦化南路的金兰大厦李敖家催稿，郑南榕对李敖是非常尊敬，

李敖写稿习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写好一张就给郑南榕一张，郑南榕帮忙吹干墨迹，还交代要把李敖的原稿通通保留。

郑南榕首次坐牢

1986年暑假，石文杰又要去日本、美国找书，又找郑南榕赞助机票，不料郑南榕被民进党的张德铭状告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意图使人不当选」，这也是郑南榕第一次坐牢。石文杰说，郑南榕入狱时，《自由时代》杂志社群龙无首，他和李敖帮忙把杂志社撑下去。从没拿过稿费的李敖，有一天竟要会计小姐算稿费给他，会计小姐算了一下，李敖稿费大概2、3万元，李敖说再加一个0吧，凑成30万，会计也不敢耽搁，赶紧拿现金给李敖，不料李敖马上把这些钱当做加菜金发给大家，当时靠这样稳住杂志社士气。

1987年后石文杰开始忙着组成教师人权促进会，之后跟郑南榕就很少联络，但1989年4月竟传出郑南榕自焚。石文杰说，他乍听到这个消息难以相信，跑去《自由时代》杂志社看，过去常常与郑南榕谈天说地，忍受他大烟枪二手烟的办公室，已经烧得像焦炭，完全看不出过去的样子。

不敢相信好友已逝

石文杰说，郑南榕过世后，他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忆他。2022年朱高正追思会，结束之后，石文杰想到去郑南榕纪念馆，郑南榕的遗孀叶菊兰特地翘班来致意，而郑南榕的女儿郑竹梅在他记忆里还是还没上小学的小女孩，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离去之前，郑竹梅跟他说「爸爸把我跟妈妈丢下来甚么都不管」，石文杰说，他听得眼泪要掉下来了，「她已经长大了，但是看到过去熟识的叔叔来看她，她又变成小女孩了。」他说，他真的不知道好友郑南榕为何舍得放下妻女、放下亲友，这样决绝地走。

石文杰说，郑南榕是个自由主义者，是从蔡元培、傅斯年、殷海光、李敖、柏杨以来一脉相承，所以不应该把郑南榕打造成台独烈士，那对他是矮化。「所以我说党外是大于民进党！」40年前大家的想法非常纯洁，只想全力对抗专制和霸权，因此可以海纳百川，当时党外的格局如此辽阔！跟如今民进党高居庙堂的政治人物天差地别。

(本文选自 2024 年 4 月 8 日《梅花新闻网》)

蔡英文 2018 年 3 月 18 日脸书

蔡英文

李敖是个勇于挑战体制、对抗权威的作家。他对权力者不假辞色，犀利的文笔、特异的言行，都让同时代的年轻人佩服。可以说那个因为威权压迫而寂静无声的时代，台湾社会因为有李敖这样的人，而不再沉闷。

他的过世，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消逝。当年他所挑战的威权，已经成为历史。他笔下渴望的自由，已经变成台湾的生活方式。而他为了抗争强权，孜孜不倦留下的数百万字，永远是台湾社会重要的资产。李大师，一路好走，也请家属节哀，保重身体。



蔡英文

李敖，永远的党外

邱师仪

时代巨轮从不等人，侠义幽默的李敖大师逝世了，他一生对抗国民党，狂妄不羁与离经叛道的程度绝对不下于网络时代的各式言论。近日他的逝世却引发了文化部应不应帮他申请褒扬令的争议。

人说盖棺论定，
事实上，盖棺论定不仅
仅是对于往生者的论
定，还有社会的评价。
反过来说，外界尤其
是绿营人士对于李敖
逝世的评价，几乎就

说明了绿营基本教义



邱师仪

派目前无法公允评价自由派人士的困窘，只要自由派人士与大陆扯上边，基本教义派就会立马将这些自由派打成反动派。哪怕有些自

由派人士冀望中国可以有别于威权的发展可能，都能被基本教义派自动屏蔽掉。

如果不会失之武断的话，李敖的意识形态也许能在雷震身上找到一点基础。1949年雷震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筹办《自由中国》杂志，这一群自由派人士起初也受到蒋介石的支持，但创刊之后与蒋渐行渐远，杂志转为监督政府，《自由中国》甚至为文反对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而遭停刊，雷震也因此坐了10年牢。雷震绝不是个保守派，和郑南榕一样，也可说是台湾言论自由的鼻祖，但如果检视雷震的论述，他要的不仅是台湾的自由，他还要中国的自由。

雷震与李敖行事风格不尽相同，李敖晚年的论述在很多人看来似乎都在为中共擦脂抹粉，但如果检视李敖的背景，他在哈尔滨出生，父亲是北大的知识分子，儿子纵使考上台大却也宁愿送北大就读，你就会知道在台湾有极少数一群人所想的落叶归根，不只有在台湾。

这一代有很多人是有良知与正义感的读书人，虽然他们老了甚至凋零了，但他们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早期党外人士对于台湾的想

象没有不同。李敖是不是一定就同意中国完全以威权方式治理？由于没有具体的发言证据，旁人无法置喙，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国民党威权时期，李敖冒死资助台独教父彭明敏赴美，李敖甚至因为「台独」罪名在 1972 年被判处 10 年徒刑。为台独坐过牢的李敖看得很清楚，在 10 年前就呛过陈水扁：「你不敢实行台独！」所以老一辈的民进党人很清楚李敖反抗威权的能耐在哪里？只有一些年轻的挺绿者会用李敖反同、仇女等新时代的标准来批判他。但殊不知李敖从来就不是这个时代的异议分子，两个平行世界是无法沟通的。

至于文化部是否应该为李敖申请褒扬令？绿委段宜康表达了基本教义派的反对立场，但其实对更多的民进党党员来说，例如曾说过「李敖死了」的王世坚就哽咽道歉，且「遗憾没能再向大师致意」，反而映照出那些曾经随着李敖冲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心声。

（本文选自 2018 年 3 月 20 日《中时新闻网》）

谢长廷：公投不能败 李敖：台湾先正名 谢语带哽咽说 有恶邻是台湾无可选择的命运 李强调自己是唯一为台独坐牢的外省人 谈判不该以一中为前提

第二场公投辩论由高雄市长谢长廷担任正方，作家李敖担任反方，辩论对等谈判的议题。谢长廷认为公投若失败将不利于两岸谈判，也会让国际社会解读为内部有分歧；李敖则说执政党不该以一中为前提谈判，应举办台独公投。

谢长廷在申论时表示，台湾自退出联合国后，声音就很难被国际听见，三二〇公投可以让台湾人民表达心声。

谢长廷说，二二八的活动，国际传媒都大幅报导「台湾人民用自己意志表达反飞弹、爱和平的决心」；三二〇公投的结果是国际

极为关注的事项，若三二〇公投「对等谈判」未过半或不成立，将让国际社会解读为台湾分裂且缺乏共识，无法展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国民意志。他更指出公投失败将使两岸谈判任人宰割，处境更困难。

李敖则在申论时先强调自己是唯一为台独坐牢的外省人，五十三年来没去过中国大陆。他拿出谢长廷访问北京时在共产党旗前的照片，表示若照片里是李敖，就会被戴上不爱台湾的帽子。他接着出示谢长廷一九九六年参选副总统的文宣，其中质疑李登辉「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出卖台湾人的利益？」但现在执政党却走李登辉路线。

李敖说，要代表台湾谈判的人一定要可靠，谈判身分与议题也很重要。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中」的问题，如果台湾接受一中，就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混淆，应该要变更国号，才能坐下来谈。



谢长廷

首先提问的政大教授赵建民说，陈总统要推动两岸和平稳定架构，两岸可以互设联络办事处，划定非军事区，展开三通等谈判，如果谢长廷与李敖能代表北京，是否同意和台北对等谈判？

李敖表示，两岸谈判最重要的是要以什么身分谈，究竟是以中华民国的身分？还是以台湾共和国的身分？陈总统公布的公投题目中，说是要与中共谈判，但中共只是一个党，政府是什么政府呢？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所以他赞成正名运动，用中华民国政府去谈会出现问题的。

谢长廷则回应，两岸谈判协商有三个要素，一是中共内部整合状况及权力斗争，二是台湾内部团结，三是国际社会情势。如果这三要素都对台湾有利，则中国可能会让步。

中山大学大陆所所长林德昌提问，因为中共不放弃使用武力，对台湾处处打压，使台湾在试图展开两岸谈判协商受阻。在政治议题外，那些重要议题有助推动两岸现阶段的协商与合作？

谢长廷表示，两岸协商谈到政治问题就卡住，可在政治与民间商业外寻求中间性质议题，例如城市、民意机关等交流。他认为对

等协商公投如果失败，中共可能在有限讯息下作错误解读。

李敖则回应，台湾若能组成真正代表族群融合的和平团队谈判，不一定会输。他批评二二八的定位，外省族群被打压，却不敢说话，民进党口口声声说族群融合，但老把暗扣锁住外省人，应该真正用族群平等的条件去谈判。

东华大学教授杨开煌提问，目前台湾内部讨论两岸议题常陷于情绪性与对立性，类似三二〇公投的辩论或公投本身，有无可能导引台湾内部在讨论两岸议题上，慢慢趋于更理性、更包容？

李敖表示，谢长廷草拟民进党党章时主张成立柔性政党，后来民进党却成为刚性政党，陈水扁又抢走党主席，谢长廷真的很可怜。他质疑陈水扁玩假的，不照台独党纲



李敖

(1935-2018)

「用公投方法成立台湾共和国」，反而用技术性问题不让台湾共和国成立。

谢长廷响应，以前也有泉漳问题、闽客问题，现在有本省外省问题，但他相信时间会解决问题；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就是尊重历史的偶然，出身无法选择，因此他只卑微要求能「台湾优先」。

结论时谢长廷举偷拍光盘的例子，站在加害者、被害者或旁观者的角度，解读将有所不同。因此三二〇公投必须用台湾整体利益，以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来看，不能用旁观者的角度来诠释。

谢长廷指出，虽然公投题目看起来可能有人不能接受，但若考虑到台湾的处境，这就是无力者与弱者的悲哀。谁不想堂堂正正要中共撤除飞弹？他语带哽咽说，有恶邻是台湾无可选择的命运，但我们不要认输，虽然全世界朋友都受到中国的压力而反对，难道台湾也要因压力而反对？

谢长廷说，台湾必须要找寻一条让台湾生存、有尊严的道路，虽然辛苦，但总算等到实行公投的一天，希望不管各种族群，都要珍惜这次公投机会。

李敖在结论时说，蒋介石以前喊「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五年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马上显示这是空头支票。他认为，蒋介石之后的第二个神话就是台独，十七年前民进党开始宣传台独，今天为何不用公投决定台湾前途？

李敖拿出文宣与书本，表示谢长廷以前说「不能顾忌中共威胁就苟且偷生」，李登辉也说「台独当然得不到人民支持」。同样一个人说不同的话，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李敖说，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说「从没说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共说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是台湾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挑拨？这种公投是不是骗人的？

与李敖分道扬镳的外省籍精英培育 路线

蔡诗萍

钱复老师，1935年出生于北平。来台湾时，他已经是青少年了。

我为何说理解钱复与他父亲，一家人的人生际遇，要与他那个时代的人脉网络，还有政治的大环境，连结在一起看呢？

不妨举个例子，而且鲜明对比的例子看吧。

李敖，已经过世的这位大顽童，大反骨，也是1935年出生于中国大陆的。钱复后来念台大政治系，李敖念台大历史系。



蔡诗萍

从钱复的回忆录来看，他在台大期间，担任代联会主席，这个学生会的主席角色，大约要到八零年代以后，伴随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兴起，才有非国民党员角逐成功的先例。

所以，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从李敖与钱复的例子来对比，当年外省籍年轻一代，亦逐渐分殊出两条路线，一条是跟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对执政的国民党保持批判监督的路线，而另一条，则是，反对共产党，跟着国民党走，在党内扮演好「忠党爱国」的角色，但也不是弄权兴利的一批，而是相信自己的专业，可以兴国，可以救国，孙运璇、李国鼎，这批财经官僚如此，钱思亮、钱复父子，亦复如是吧！

但对李敖，这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认知则显然不同。

从国族认同来看，他们无疑属大中国认同者，只是，在民主政治上，他们倾向于自由民主的选择，因而对蒋氏政权的专断，国民党的不民主，则不遗余力加以批判。

这就促成了李敖与钱复，一个世代，却平行发展出两条外省籍

知识精英的路线！

我进台大念书时，党外运动逐渐蓬勃，到了美台断交，「美丽岛事件」时，可谓中华民国的认同危机与岛内民主运动都到了新的转折点。

那是八零年代，跳跃前进的前夕，台籍精英也好，外省精英也罢，都在跃跃欲试，未来的未来！我辈中人的大学生，除非已经立场明确了（无论是忠党爱国，或党外参与），否则，多半是在彷徨犹疑中，摸索前进的。而台美断交，而美丽岛事件美丽岛大审，都是关键性的分水岭！

从《钱复回忆录》卷一来看，钱复老师与李敖前辈，完全是没有交集的两个外省籍台大精英。他们唯一的交集，或许在胡适。而因为胡适的交集，而继续扩散出去的连结，则是彭明敏。有趣吧！

胡适与钱家的关系，始自于钱思亮，因而，钱复到美国念书时，还不时到纽约亲炙胡适的教诲，钱复与夫人田玲玲的婚约，胡适夫



钱复

人胡江冬秀女士还扮演见证人角色。

而众所周知，胡适是欣赏李敖之才情的长者。

从钱复、李敖两人，与胡适的关系来看，胡适做为他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宗师，亦可看出他的矛盾内在：一方面，他秉持五四以来自由主义的精神，对威权对专制保持批评警惕，这是他欣赏李敖的原因；另方面，他专业知识分子出身，对以专业报效国家，情有独钟，钱复的矢志外交，当然也在他的鼓励范围之内。

胡适的矛盾，看在李敖、殷海光之类的人士眼里，不易理解，可是，回归到他的性格上，他的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做选择的判断上，这矛盾却不是不合情理的。

至于彭明敏的连结，乃因《自由的滋味》里，彭明敏曾说，当年到加拿大攻读博士，经济窘况，胡适曾伸出援手，但彭一直以为是胡适找了奥援来帮忙，多年后才知道，竟是胡适自己掏腰包赞助了多年！这份温暖让这位台独大老，多年后仍深深铭记于心。

而彭明敏于钱复，不过是授课的老师，于李敖呢，则是反对国民党威权独裁的同路人。

钱复老师的回忆录，完全不见李敖、彭明敏、殷海光等，那时的自由主义印记，其实充分证明了，钱复家族是活在一个与台大之自由批判学风，平行发展的时空里！

理所当然，他们一直是国民党的知识精英！拿了博士学位，回到党国体制内，成为专业官僚！



记苦苓与我的陈年往事

石文杰

托斯基是苦苓的另一笔名，戒严时期他在党外杂志写嬉笑怒骂文章，极尽辛辣尖酸、挖苦之能事，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那就是苦苓。

曾一同去见李敖

记得那年，李敖在党外杂志上看到托斯基的文笔犀利刻薄，想见见本人王裕仁，就透过我予以引见。1985年某一天，两家人相约自台中一道北上，抱着朝圣的心情到敦化南路李敖家，刚好党外人士颜锦福也在场，于是四个人合照了一张照片。

由于当时我俩的小孩都还很小，又十分顽皮好动，大人忙于聊天畅叙，小孩竟玩得不亦乐乎，把一向干净、整洁的李家，搞得天翻地覆、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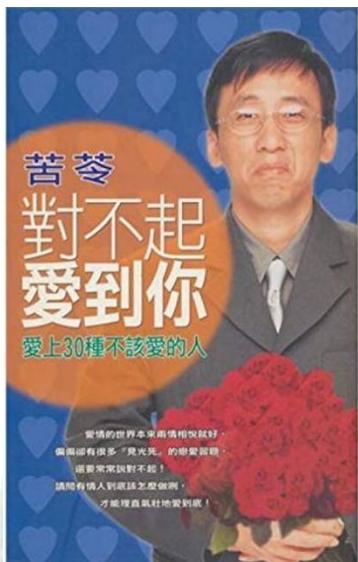
苦苓

不忍睹。据后来李敖说，简直像发生一场大地震，我们走后他花了好大一番劲才整理妥当。

苦苓的托斯基时代

苦苓原名王裕仁，父亲东北人，母亲台湾宜兰人，是我台大学弟，只是不同科系，他念中文系，我是历史系，有一段时间两人都在台中县的私立高中任教，他住乌日，我住大里，两人也都常在党外杂志撰稿，赚点外快。我笔名史为鉴，他则以托斯基在一家杂志写「托斯基万岁」专栏，后来郑南榕透过我高薪将他挖来《自由时代》写专栏，当时他已经以「苦苓」在文坛鹊起，还担任《明道文艺》的总编辑，他不想泄漏真名，因此每周都透过我亲自送稿去杂志社。

当时我每周周末上完课之后，立即搭乘国光号北上，为郑南榕所经营的时代出版社编辑《时代系列丛书》，苦苓就交代夫人苏玉珍女士在台中公路局车站转交稿件。后来出版社还集结出了专书—《托斯基万岁》，郑南榕给了苦苓一笔丰厚的稿费，苦苓为了酬谢我送稿辛苦且保守秘密，两人还去疯狂地花天酒地一番。



苦苓作品

我和苦苓都住在台中县，近在咫尺，因此两家过往甚密，有时懒得做饭，举家就到对方家吃饭。苦苓只有一个儿子，父子长得十分相像，长相和个性简直是苦苓的翻版，而年龄又和我儿子相仿，两个小鬼玩起来可谓地动山摇。因为我俩都在郑南榕和吴祥辉所办的杂志写稿，因此每逢农历过年，两位到了台中，都会到两家拜年，有时拜完一家，就一起到另一家，大家聚聚聊天泡茶，十分惬意。当然最高兴的是两家小孩，因为都会收到一笔不小的红包。

苦苓成为畅销作家之后

苦苓一向幽默风趣、讥讽伶俐，文笔又平易近人，颇受莘莘学子欢迎，有一段时间其著作经常上畅销书排行榜，每家书店都摆在醒目的位置，也往往一夜之间就全数销售一空。后来苦苓以幽默风趣转进电子媒体，担任节目主持人，收入倍增，加上生性爱玩又喜

好美色，结果闹出离婚事件，前妻还出版了《一个作家的死》，加以影射丑诋，对他打击甚大，搞得苦苓只好退出电子媒体，其著作也全数被退货。苦苓从此埋名隐居，不问世事。

事隔多年，有一次我和家人同游乌来，在内洞瀑布底下发现一位坐在折椅上埋首阅读的奇人，外甥眼尖当场识破。眼见多年不见的好友，就立即上前关心问好，想不到竟然冷淡到不愿多说一句话，与当年熟络热情，简直判若两人。不过，两年后，我利用暑假偕内人到武陵农场度假，碰巧又遇到在那儿当解说员的苦苓，当晚同桌一起用餐，有说有笑，一如当年，原来他已走出阴影恢复元气。

我因在私立高中担任文史教师，常为党外杂志写稿，又热衷于党外活动，让情治单位十分感冒，屡次透过校长规劝警告，终于在解严前三个月，被以不续聘赶出校园。当时我向媒体透露，将推动教师组工会以保障教师的权益，那时对我极为关切的苦苓，告以《工会法》第4条限制军公教不能成立工会组织，必须另辟蹊径，所以才有教师人权促进会的成立。但很遗憾的是，一直关心我、支持我的好友—苦苓和林双不，始终未入会。

离开学校后，我先忙于教师人权运动，苦苓则摇身一变成为电视台名节目主持人，从此两人渐行渐远，鲜少往来。离开校园六年后，我又考取教师甄试回到校园，平日在校辛苦耕耘，偶而笔耕针砭时政，目前已自杏坛退休，过着闲云野鹤般的退休生涯。苦苓也已从绚烂归于平静，担任武陵农场雪霸国家公园生态解说员，每天徜徉于森林原野，与野生动植物为伍，倒也十分惬意！最近还传出他再婚的消息，过着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在此祝福他俩永浴爱河、白头偕老。

专访李敖痛批台湾学运

童清峰

台湾知名作家李敖痛批反服贸学生不敢承认中国、不敢面对中国问题，把未来台湾的经济核心利益牺牲掉了；痛批服贸是美国威胁世界的全球化的阴谋；痛批马英九团队太弱，无力应付。

反服贸学运延烧

超过二个星期，三月三

十日学生发动游行，五

十万身穿黑衣群众把

总统府附近周边道路

挤爆，台湾社会对学

运的支持远远超过预

期，也让学生占领立法院议场更加坚定。知名作家李敖对这场学运

有深入观察，二十七日晚间列出七点，指学运引发广大效应，证明

「台湾民主全是假」、「没人说中国好话，青年对祖国没向心力」、



反服贸学运

「共产党对台政策失败」、「两岸台湾专家是外行」、「选出马英九做伪总统是两岸共同错误」。三十日上午，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旁征博引，言人所不敢言，表现一贯李敖式的畅快淋漓。以下是访谈纪要：

●你对这次学运有什么评价？

主要有几个关键，有几个大前提要把握住：第一、台湾青年表现再出色，你在中国的前途上没有把握到，你不敢承认中国、不敢面对中国问题，虽然你未必是台独分子，香港也这样子，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虽然未必是港独，但他也不要当中国人，这个大前提没有把握住的话，接下去的推论都是错的。台湾今天情形表现再成功，也是失败的。

●这不就是反中的表现吗？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反中的观念已经六十四年了，从蒋介石开始，到台湾来这样子，这个教育是蒋介石根深蒂固刻意造成的，不管蒋介石死不死，共产党改不改，国民党放松了，但蒋介石的阴魂不散，跑到民进党身上去了，今天很有趣，今天反中强烈的不是国

民党，反倒是民进党，所以真正是蒋介石的真传到民进党身上去了，你不觉得很可笑吗？学生跟共产党没有渊源，却这样恨它，恨到这种程度，甚至用牺牲自己未来的方法来恨它，太有趣了。第三个原因，被美国裹胁，美国全球化本来是个裹胁运动，你要跟着我走，不然就出局，所以全世界跟它跑，可是裹胁的结果，第一个占便宜的是资本家，其他的还是靠边站，共产党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走，台湾根本没有抵抗能力，只能跟着走。但台湾经济政策如果走这条路的话，是不是正确？所以我说台湾应该回头走老路，放弃工业化，放弃核电，回去小国寡民的生活。

●要回到钻木取火时代吗？

倒不要那么严重，你不需要那么多电嘛，台湾的电都给郭台铭了，我讲过，郭台铭赚的是代工的钱，多少钱呢？我告诉你，美国的五十分之一，美国苹果赚的钱的五十分之一给郭台铭，大家觉得郭台铭很有钱，台湾的账面很好看，可是老百姓得不到实惠，至少短期得不到实惠。中共的台湾政策完全错误，如果是看法错误还不严重，但现在的情况是根本在勾结，（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跟（前

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根本在勾结，陈云林拿的干股有百分之十五，他们在香港搞公司，已经在乱搞了，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看法上的不同了，而是国民党的官僚系统跟共产党官僚系统的利益结合，我们对这种现象很忧虑。

●这部分能否进一步说明？

我知道的情况是，陈云林的团队跟江丙坤的团队在香港结合，北京在里面分了百分之十五的干股，详细情形还有待你们调查，但有这样的讯息出来。昨天北京给陈云林跟江丙坤颁奖，他们两个好意思要吗？台湾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全都怪民进党、怪学生吗？你大陆对台政策错误嘛！别以为对台湾花点钱、让点利，服贸协议对台湾承诺开放八十项，对台湾比较宽大，不够的，台湾一般人得不到好处，当然就反了，这证明对台政策失



陈云林

败，这是更严重现象，台湾青年人对中国的看法整个失败，也不想改正，这背后也是共产党的政策失败，因为它跟国民党官僚系统、连战系统（江丙坤是典型的）勾结，徐立德在上海买医院等，明显就是权力的勾结、特权的勾结。

● 马英九犯了什么错？

马英九有一点正确的，就是把江丙坤赶下来（笑），你们应该下台了，为什么还把持这局面呢？可是马英九跟毛泽东犯同样毛病，



江丙坤

(1932-2018)

毛泽东太相信四人帮了，但四人帮不成器，不能接班，把老将赶掉了，但新人接不上班，所以搞乱掉了，「你办事，我放心」这

批人不堪一击。马英九团队没有可用之人，你看他身边的人（指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智强）连电视节目都搞不好，他的团队不行。可

是这整个局面不单纯，我们乍看是学生运动，但学生也糊涂，共产党也错误，马英九也无能，可是有一批人占了便宜，就是江丙坤为主、官商勾结的这批人。

●现在情况似乎无解，你认为要怎样让学生退场？

情况未必越演越烈，马英九要抢回立法院，太容易了，技术问题，行政院都抢得回来，为什么立法院抢不回来？喷瓦斯、喷水龙头就抢回来了，抢回来以后，立法院要还给王金平，立法院就不能动，马英九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一开始（两岸服贸协议）不能逐条审查，可是现在价码变高了，这就是陈仪当时二二八的现象，陈想跟群众谈判，可是跟群众怎么谈？没有底价，变成浮动汇率，本来学生讲占领立法院多少小时就要出来，只要你逐条审查就好了，但现在是什么条件？所以现在已经乱掉了。

●学生现在的要求是退回服贸？

退回就死掉了，时间就把你拖垮了。

●所以马英九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

他现在就像车祸卡在中间，进也进不动，退也退不动，整个被

卡住了，国民党也被卡住了，学生们乱七八糟的，可是学生有很多种，多数是起哄的，好玩，这是年轻人心理，去插花、作秀，并不是有意识形态的，但他们把中国因素丢掉，把美国因素丢掉是错误的。

● 怎么样做才是正办？

还要乱，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再闹一闹，再说吧！可是我认为对台湾本来长期不利，现在短期也不利。

● 王金平不动用警察权，要如何收回立法院？

王金平放话了，这不是立法院内部的问题，意思不是立法院警察所能解决的，马英九名正言顺，现在的解释不通嘛，行政院是政府机构，立法院不是吗？它当然是公家机构，我当然可以把你赶走嘛！可



王金平

是赶走以后还给王金平，对马英九没什么好处。至于学生问题，在一个动乱里面，本来就会有人吃亏，

有人占便宜，可是你现在看到很惨的现象，今天学生不能出头嘛，闹了半天，我们只记得二、三个人，证明他们花拳?腿，年轻人爬不起来。

●你支不支持服贸协议？

我当然反对，我刚刚讲过，这是美国全球化的阴谋，但我们躲不掉，问题在这个地方，被美国人吃掉了，什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跨国的，资本家不是美国的了。为什么躲不掉？因为我们没有三个地球，大陆说我们现在要走美国路线，要大家有钱，中国人全部过美国人生活，世界资源不够分配，要三个地球，我们不可能有三个地球，所以就像邓小平讲的，我们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没有错，富到美国程度也没有错，法拉利跑车照开，可是另外一部分穷人爬不起来，因为他爬起来世界资源就不够分配了，所以我们现在走美国路线，最后是追不上美国，只有一部分人会追上，那是特殊的搞鬼的人，这条路走不通，共产党不敢讲说要回到以前，现在要老百姓穿以前蓝色的毛装，老百姓不肯，但坚持要走美国路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共产党以前是革命太多，现在是革命太少，所以非常

麻烦。

●学生批评马英九已经失去统治的正当性？

根本是伪政府！什么失去正当性，你中华民国亡国了嘛，蒋介石已承认在一九四九年亡国，台湾是中国千分之三领土，首都丢掉



马英九

两次，你说你代表中华民国，怎么可以？中华民国是个死尸，被国民党看住，国民党在守尸，如果不看住，民进党会借尸还魂，台独是孤魂野鬼，现在就是借尸还

魂，你看看，民进党的论述，本来是中华民国到台湾，然后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现在中华民国是台湾，很多人怕民进党抢死尸，所以支持国民党，现在很荒谬，青年人变成共产党。

●怎么讲？

我发现一个现象，真正台湾的大学生自己做了共产党，他们反

服贸、反资本家，没有理想主义，打来打去，这是共产党的行为，他们糊里糊涂变成共产党，而共产党不再是共产党，已经变成资本家了。但希望中华民国存在的是共产党，不是台湾这批人，希望在中华民国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能够缓冲一下，死尸不要烂掉（笑），那是荒谬剧了。

●现在国会瘫痪，你觉得是严重的宪政危机吗？

我讲过，国民党是学共产党的结构，而民进党又学国民党结构，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是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怎么能创造出民主的果实呢？先天不足，它不可能变成民主政党，所以两个党在国会就是搞密室协商，我亲眼看到他们像菜市场一样在分肥，所以台湾民主是假的嘛！学运本身它有理想主义，它是共产党，可是他也是「小表哥」（指脆弱漂亮的小男生），现在你占领国会就是革命行为嘛，但你又不敢承认这是革命，一说要收押，就吓得哭起来了（指带头冲撞行政院的魏扬），最后妈妈把他带走了，「小表哥」母爱又出来了，妈宝都出来了，这搞什么革命啊，丢人丢死了！革命党一说要收押就变小表哥，妈妈出来就变成妈宝，那天前民进党立委

谢聪敏打电话给我，我问他台湾怎么了，怎么连一个英雄都没有，就没有一个说「我是革命党，要推翻你们，事情我干的，敢作敢当」，不要狡赖，什么（扁家律师）顾立雄（替魏扬辩护）说是路过帮忙。我是英雄，你却说我是路过帮忙，当年国民党要审判陈独秀，他的律师章士钊替陈独秀辩护，说他没有反对政府、没有推翻政府，陈独秀当场骂他的律师，「我就是要反对这个政府，你怎么说我没有反对」，台湾学生没有英雄，连一个也没有，每天都耍赖，很好笑，你说他不天真，又很天真，把未来都牺牲掉了，未来的经济核心利益都牺牲掉了，恨共产党，这是理想主义者，这是蒋介石的第一流信徒，蒋介石都没有这样恨共产党。

历史的隐居者

陈文茜

如果不是这面橘朱红的砖墙在台北正午阳光日照下，实在太耀眼，你很难愿意驻足一分钟；且即使多看个两眼，一般行人恐怕也只觉得此地不过是另一栋破旧的台大宿舍。

从台北新生南路
紫藤庐隔壁小巷走进
去，你会经过两排难得
整齐的公寓，阳台种着
妖艳的九重葛，走到底
便会看到这面朱红砖
墙。



李敖与陈文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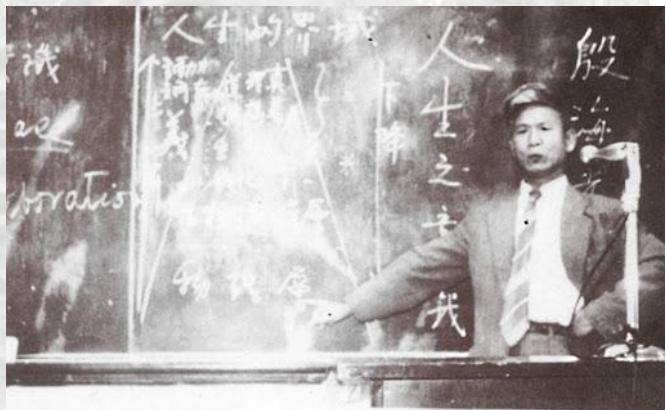
墙里长得三楼高的枫树，虽是春意嫩叶，却也不得不呈露苍郁；只因一旁的老宿舍实在太旧了，如此匆匆挥霍流行的城市，怎么可能留下沉沦的老式住宅呢？

走进墙里，像在没落小区里寻找没有门牌的人家，文史学家指点，顺时针十二点后方，那个看似废弃的老建筑之后，便是殷海光的家。

殷海光生前就住在这里，他是除了胡适之外，50年代台湾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从当台大讲师、教授，到被赶出台大，成为续聘教授却不得开课，殷海光一生都住在这儿，直到1969年9月15日送至台大医院病危前，整整13年。

殷先生生前

不求名，也不怕向人借贷，本来台大不聘了不给薪水时，他还想做个小生意。



那时国民党

殷海光在课堂

特工天天去巷口站岗，他在池子里泡完汤，刚好精神抖擞，索性叫骂一番。国民党控制的教育部门一方面逼着台大不给他开课，一方

面又拿着聘书叫他当顾问，等于领威权体制的赡养费。按汪幸福著的《殷海光传》，殷先生认为此乃“包藏祸心”，把顾问聘书往外一扔，叫送聘书的老党工滚蛋。

我的老友李敖说殷海光喜喝英国下午茶，没书教时想做生意却非赚钱的料，只能靠太太做裁缝贴补。即使叙述他人如此无遮无掩的李敖，也永远记得给殷海光一个没人能抢的位子：“五四时代后，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殷海光没书教后，国外研究机构请他，仍被蒋介石禁足，海耶克学术会来台也不派他参加。他曾自我调侃：“我成了笼中鸟。”“我已成众矢之的，我的门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街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陷入座围城，且无地容身，实际的低度生活也日渐困窘。”

人们可能不知道，殷海光死的时候极其卑微，比如要不要接受弟子的接济，该不该打点滴，住一等还是二等病房。哲人走了，舍不下的是他浪淘中抓不住的社会，但缠绕着的却尽是穷困的金钱窟

境。

殷先生走之前，见到弟子们时说：“这次不行了。”众人静默不语。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口：“我并不怕死，只是觉得责任未了。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

50年代来台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看着自己家也散人将亡，在隐居的孤岛上喊：想挽回时代的良知，但何其难！1958年，殷海光不愉快地又被软禁了11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1969年9月16日下午4点，殷海光先生失去知觉，5点45分去世，享年50岁。

殷先生死前，曾说他责任未了，看着时局，死不瞑目，他死的时候眼真没合上。他的家人后来经人多方奔走，才一个一个远离台湾，夫人在美“当过佣人、当过大厨，每天在餐馆工作14个小时”。殷夫人曾在《殷海光全集》的序言中，问这个他们付出甚多的社会：“我们的不幸及牺牲值得吗？”

身为后代的中国人，我没有勇气回答，你有吗？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 - 中共“台湾文化招安之旅”

蒋品超

引子：中共“台湾文化招安之旅”从连战、宋楚瑜、郁慕明一路走来，现在轮到了李敖。把李敖当作中共的斗士形象来夸张李敖“神州文化之旅”，这是有关媒体的精心炒作，很多朋友，甚至连中国大陆一些资深的民运朋友都大大的受骗成了李敖追星族，真让人遗憾。中国民运是大众的事业，付出的是中国民运人士艰苦卓绝的心血乃至宝贵的生命，而不是而今甘作名士的李敖以接受招安的实质用貌似民运的几句怨言所能作到的。



蒋品超

很多朋友因为李敖过去骂过国民党，因为明星效应竟致在潜意

识里忽略了台湾民主是台湾民主运动争得的事实，而产生错觉以为李敖是台湾民主的旗帜，这是错的。李敖骂国民党有能，但台湾民主是民进党人通过民主运动争得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台湾能和平演变为民主政体则是国民党的雅量，而国民党的雅量则正是民进党、李敖现象能存活的原因，这则是另一层。

在大中国历史上国民党是一个有雅量的党，它的机理之中不象共产党绝对排斥异质文化，或者说绝对同化异质文化，正因如此，在它的体内存活了两个实质的政党，一个把它赶向了台湾，一个将它变成了在野。

李敖作为饱读经传善于审度的文人深知国民党的厚道、共产党的刻薄，因此，就有了昨天国民党党外的李敖斗士与今天共产党堂上的李敖名士之异。

我在《李敖的北大秀》一诗中曾有这样一段形象而精辟的阐述：

多少老虎，

都没把那铁板一块天翻地覆，

在笼子里装虎成功的猴子，

眼明心精，

怎么可能忘记了得道的秘密，

不演戏而去玩真？

娘子想操，

牌坊还得立，

所以言论自由的旗子下，

便找来一头似虎非虎非猴真猴的怪物！

从前面操，

是举着红旗，

从后面操，

也不会换成绿旗，

即使上下齐手，

你当他真会打着红旗反红旗？

这段深刻点明了李敖的实质——李敖是一极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不过是他幌子。

他的个人主义表现在他以机巧追逐名利的深度欲望。在不可能

加官而只能以文与国民党斗，并只有以文与国民党斗才能获取名利时他与之以文斗，且显示出一股仗义侠士之气获得人们喝彩，这时他以文人自居不与为官为伍；当以文斗成为不足在觉得近官为上时他选择涉足总统竞选、立委选举，而与曾



张宗昌，我想起了你

经的对手宋楚瑜宽带解襟，失去是非。李敖的实质是个人主义的，他的看似仗义侠士之气是貌似替天行道的实质为个人英雄牺牲。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内容由民本、人本与爱国随意构成而不断变化，其宗旨是为服务于他的个人主义自我名利的追逐。

看过不少网文，所有有关此次“神州文化之旅”把李敖当作中国国民运人士范本而寄以希望竟至欢呼欢庆或失望失落的朋友都是自己不知，没看到李敖的本质，而对其一厢情愿投以太大关切所致。要知道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 其实只是台湾人们“西进运动潮”

中的一波水流，而且是应约而至的一波水流，根本不具有逆流“东进”的意义与可能，张开耳朵准备听“民运之声”的人们都是自己犯单相思。他的那些北大讲台上的牢骚就象台湾所有“西进潮”中人们已把中国政府的耳朵磨出茧子的抱怨一样在那里讲讲而已，不过李敖因为是名士比其他人多了北大的讲台与凤凰卫视的镜头。

李敖是因为是一方名士而被中共引为座上宾作为招安的对象延揽去的；是眼见连战、宋楚瑜、郁慕明趋之若鹜应邀奔向大陆后，夸张的媒体暴光率让他又眼见名利而不甘寂寞，也应约而去的；他的响亮的“神州文化之旅”其实只是继作“和平之旅”的连战、“搭桥之旅”的宋楚瑜、“民族之旅”的郁慕明后又一个被中共作为“反民(民运)”、“剽独(台独)”的尊贵的“统战代表”邀约所作的“文化招安之旅”。他在北大几秒钟口头上的硬硬不过是享受中共为有着硬硬光环的李敖名士所给的一点面子，这点面子在清华善于审时度势的李敖立即就知趣的不再争取了。所以在北大他对连战的奚落，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中名士之间一次经典的“五十步笑一百步”。

2005/9/26 洛杉矶

文人无行！主张全盘西化，罔顾民族大义，“台独”导师李敖

武之璋

李敖是享誉两岸的名人，而且一直以统派自居，大陆也把他视为“台湾统派”代表人物。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参加民进党），也是民进党的理论大师。

民进党的许多核心价值的论述以及对国民政府，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否定的理由几乎全部来自李敖的



武之璋

说法，其资料也几乎全部来自李敖。当然民进党大量选用李敖否定中国文化，羞辱国民政府的部分，用以建构文化上本土化、去中国

化，以及政治上主张台湾独立的理论。但是对于李敖主张统一的部分完全视而不见。

李敖的文章等于替民进党打下了去中国化及“台独”的理论基础，但是李敖的文章对外省人影响不大，因为外省人的文化基础深厚，很多外省人出自书香世家，不容易被李敖撼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信念，其次很多外省人属于军公教家庭，许多人本身经历过抗战、“台湾光复”、49年“大撤退”，本身就是历史见证人，所以不会相信李敖的谣言。

1957年中央社创办人萧同兹的儿子萧孟能创办了“文星杂志”60年代开始文星杂志已经变成台湾最畅销的杂志，文星杂志的老板萧孟能力捧青年作家李敖。1963年李敖出任文星杂志的总编辑，因为李敖主张全盘西化，引发台湾东西文化论战。与胡秋原、徐复观等从笔战到对簿公堂。十分热闹，平心而论，东西文化论战对台湾社会对东西文化的研究、比较是有很大正面影响的。但是没有想到李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以及全盘西化的主题会变成“台独”去中国化的理论及资料的宝库。

文星杂志在李敖一手操控下内容由文史渐渐转向政治。李敖也与许多异议分子往来。李敖渐渐受到国民政府“关注”。1965年12月文星杂志被勒令停刊，文星杂志走入历史。文星杂志走入历史，李敖因为协助当时的“台独”领袖彭明敏逃亡，帮“台独分子”向联合国人权组织告状等罪名被判刑十年。实际坐牢五年八个月后释放。

释放后国民党安排他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领副教授待遇。李敖出狱后以悲剧英雄的形象在台湾又呼风唤雨了多年。其间可记者如下：

一，利用其搜集私密的工夫，掌握了一些要人的私人资料，然后对这些人进行勒索。受害人包括余纪忠、王惕吾、秦孝仪等。

二，娶电影明星胡茵梦，轰动一时。因为胡茵梦是气质出众的大美女。但是他跟胡的婚姻维持不到一年即离婚。

三，跟当初提拔他的萧孟能反目成仇。萧孟能告李敖侵占，因为胡茵梦在法庭替萧孟能作证。法庭认为李敖侵占罪成立，李敖因而被判刑入狱。李敖为此或写文章或在电视节目中辱骂胡茵梦数十

年之久。

四，李敖出狱后台湾社会已经有很大的言论自由。李敖在这段时间写了大量的秽史歪曲国民党历史，羞辱孙中山、蒋介石。同时

也帮党外（民进党前身）杂志写文章，甚至出钱帮助他们编杂志、搞活动。一直到多年后还对他这一段历史自吹自擂，洋洋得意。

五，李敖因萧孟能案坐牢后在台声誉大跌，后来到北京演讲以后，李敖的声望跌到谷底。大家原来以为他是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后来大家果然发现他只敢在国民党面前表现风骨。

不能否认李敖书读得不错，文笔很好。李敖文笔清晰、明快，不用典，不用艰涩词汇，深入浅出，对中国文字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曾经跟徐复观打笔战他说徐“徐徐反反复复观看”暗讽“徐反复观”。可惜的是李敖心中没有是非，一个没有是非的人怎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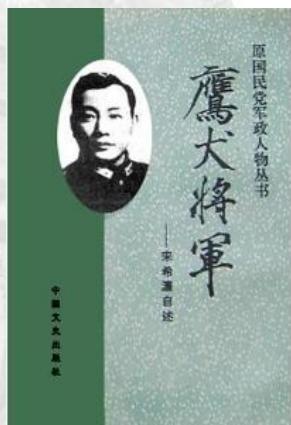
羞辱得好！

以做学问呢？他写过许多烂文，他的文章经常断章取义，用孤证，统战手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批评蒋介石引宋希濂回忆录、沈醉回忆录等，而且一引就是上万字。他甚至大量引用“金陵春梦”的内容羞辱蒋介石。李敖是一个文人无行的代表。李敖的“史学”也破坏了北大、清华、中央研究院传承多年的学风。在台湾的史学界做了最坏的示范。

李敖在国家认同方面也是混乱的，李敖以统派自许，但是一直帮助民进党推倒追求国家统一的国民党。李敖对民进党的成长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是：

一，李敖是外省人，外省人支持“台独”，补强了“台独”的正当性。



“蒋公”日记才是信史！

二，李敖文章犀利，读者多，对民进党初期有开疆辟土之功。
三，李敖对国民党、两蒋历史的全盘否定，给民进党找到了一个“非‘台独’不可的理”。

四，李敖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结果替文化“台独”铺了路，并延伸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是外来文化的理论。

李敖走了，他没有虚度这一生名闻海峡两岸，风光、风流了几十年。但是公平地盖棺论定，在大是大非上他罔顾民族大义，一直帮助民进党进行“台独”，在学术上一直把自己关在蒋介石的牢笼而无法提升自己的格局，以致至死都没有成一家之言。

李敖——台湾民主的祸害

茉莉

正在海内外沉痛悼念赵紫阳的时候，新任台湾“立法委员”李敖在那边厢疯疯癫癫地叫嚷，说要在他的逞究室里“挂满美女图”以调剂心情。这个为六四大屠杀辩护的流氓文人，大陆刽子手的台湾帮腔和帮闲，此时，更令我们感到厌恶透顶。

厌恶之余，不免要问
这样一个丧失基本人性
良知的人，怎么会被台湾
人选上“立法委员”，堂
而皇之地入驻立法院？

在民主程度较高的
北欧国家，一个人只要在
关于人类屠杀的问题上，



赵紫阳
(1919-2005)

发表支持刽子手的言论，他的政治生命就完蛋了。前不久，瑞典左

派党（其前身是瑞典共产党）的党魁，仅仅说了他仍然是“共产党人”这样一句话，就不得不面对一场铺天盖地的社会大批判，本党党员纷纷站出来和他划清界限。由于担心这位党魁的言论影响缺少历史知识的年轻人，瑞典人重新公布了大量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的证据，以清算共产主义的罪恶。

然而，台湾的李敖，不但不因为他的那些赞扬暴力的纳粹式言论而受到惩罚，相反，还出人意外地被选为议员。这种奇怪的现象说明：台湾的一些选民缺乏基本的人文素质，比较庸俗浅薄。比起北欧国家，台湾的民主还不很成熟。

是什么样的选民支持这样一个文痞流氓呢？由于李敖持一种大中国主义的立场，并恬不知耻地谄媚中共强权，因此，投票给他的选民既不可能是坚定的“独派”，也不可能正经的“统派”，而很可能是比较中间的选民，以及一些不够理性的“深蓝”选民。但是，为什么这些选民会对李敖这种人有兴趣？

按照李敖好友陈文茜的说法，李敖是一个“不说谎话的人”，是“诚实勇敢”的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被人视为“讲真话的人”，

大概是李敖吸引一部分选票的魅力所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古往今来，面对执政者直言不讳的人，都是深受人民敬佩的。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勇敢抗争的李敖，确实曾给人留下敢言的印象。

但是，在台湾有了政治自由的今天，尽管对权力发言仍然是民



有的人一年三百六十四天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唯独到六月四号就开始“中国”起来了

主社会的必需，但李敖的个人角色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除了媚共的反动政治立场之外，他还不断地骂人炫耀，从一个勇士变成媚

俗政治的一个象征，给正在走向成熟和理性的台湾民主造成危害。为什么同样一个李敖，在威权时代被人视为英雄，却在民主时代却被笔者视为祸害呢？

这是因为，在威权时代，一个人在权势者的高压之下，竭力说出自己要说的话，不管正确与否，都有争取言论自由的意义；到了民主时代，人们已经享有了言论自由，“坦率敢言”这种品质，就必须配之以知识、教养和良好的道德。否则，一味口无遮拦、言不及义，这种“敢言”虽然也是基本人权之一，但它的负面意义就此彰显出来了。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探讨民主制度和说真话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就曾指出：“某些特定的人对民主制度颇具危害性。”他列举的这种人的特征，李敖全都符合，例如，“嘴如泉涌，傲慢，厚颜无耻，虚张声势”。在表面上看来，这种人好像是“说真话的人”，但实际上却是伪劣冒牌货。缺乏道德和理性的他们，发出的只是毫无节制的噪音。

在福柯看来，这种聒噪者的危害之大，甚至有导致民主制度毁

灭的可能。因为，当整个社会都听从这些无知、厚颜、非理性却大张旗鼓的“噪音”时，群体的社会生活便会陷入绝境。由于李敖善于卖弄学问、自吹自擂，哗众取宠，不少文化程度较低的台湾人很容易被他唬住，他们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不知不觉地跟随李敖，麻木了自己的良知——少有台湾人对李敖恶毒的六四言论提出抗议，即是一例。

从李敖在当选议员前后的一系列滑稽表演，便可看出，他存心把严肃的立法机构，变成一个杂耍打闹的场所。早在李敖当选之前，陈文茜便表示，她之所以陪同好友李敖登记参选“立委”，是因为台湾处在非常时期，需要“上道的大流氓”才能制衡，而李敖是“更会讲脏话、耍流氓的人”。



看着美国掏空台湾的人配谈良知吗？

而李敖本人则坦承：“这一次选举的情况对我说起来算是游戏人间，废物利用的一个试验。”在2月1日台湾立法院的新任立法委员就职宣誓仪式上，李敖拒绝向孙中山国父遗像宣誓，而是戴着墨镜，自恋式的对着自己的相片宣誓就职，一时又制造了轰动媒体的搞笑新闻。既无为社会服务的理想，也无问政能力和经验，李敖将成为干扰立法院工作的一个活宝。

这样无厘头的搞笑搞多了，就会对台湾民主构成很大的威胁：真正有价值的言论，很可能被李敖一类似是而非的聒噪所掩盖，以致失去它应有的影响力；真正正直而有才华的人才，有可能被李敖一类呼风唤雨的人所排挤，以致丧失他们的位置。在当今台湾政坛，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已经是一种现实存在了。

正在走向深化的台湾民主需要保卫，要避免李敖一类的厚颜聒噪者的危害，台湾选民需要提高集体的人文素质，需要足够的智慧，分清李敖的诡辩和真知灼见之间的区别。曾经有人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有了高素质的选民，李敖这样的堕落狂妄之徒，才没有他在立法院耍流氓的机会。

李敖中国之行评价各异 有肯定有失望

周慧盈

著名作家李敖三十日结束“神州文化之旅”返台。相对于台湾媒体相当一致的吹捧声，中国大陆对李敖的表现有各种不同评价，除了掌声，有些期望他“能带来一点什么”的人，失望的发现“李敖变了”。

李敖结束十二天的中国访问行程，返回台湾。他此行造访了北京、上海与香港，并在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发表演说，

在最受瞩目的首场北大演讲中，李敖提到了自由主义，宣称共产党终会消灭；在清大时则赞扬在中共主政下，中国达到汉唐以来所没有的盛世；在香港，李敖呼吁港人勿盲目追求政治改革。

著作等身的李敖在两岸有数不清的读者，享有“大师”之名，许多大陆读者因为李敖的到访而兴奋莫名，“看了一辈子他的书，终于有机会可以接近大师了。”

透过电视与网路，这名任职中共官方媒体的“敖迷”看到北大全部演讲过程。他认为，李敖敢在中国的土地上谈自由主义，十分有勇气，而且演讲用词新鲜、辛辣，完全是李敖风格。

除了肯定的声音，部分舆论和北京人士也有不同看法。

以风格清新见称的北京新京报多次刊载读者评论，其中一篇指“少年读李敖的书长大，把他当作偶像；长大了悲哀地发现李敖变了。”

评论说，李敖骂人“不地道”，在清华演说中大骂美国人，指美国是因为觉得羞愧才退回庚子赔款的钱，并以此援建了清大。

这篇评论说：“即使胡适等人写的庚子赔款经过，也认为主要原因出于美国认为义和团事件表明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启民智，与其要中国赔款，不如投资在中国教育，更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很难想像李敖大师一个全盘西化的鼓吹者居然歪曲历史。”

北京三联新闻周刊则为李敖做了两页的报导，引言中借用他在清大演讲的一句话“报告刘老板，讲到目前为止还安全吗？”点出文章的主题“李敖，商业化归来”，将李敖此行与主办这次访问的香港媒体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番介绍。

实际上，认为李敖此行是商业之旅的人不在少数，但也多半可以接受，并指在传媒与商业过度发达的今天，文化与商业的结合，似乎不可避免。

期待李敖的人真正在乎的是，一生都扮演批判者角色的李敖，能带给大陆民众怎么样的思想刺激？特别是民主思想的启发。

长期推动中国大陆基层民主的学者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认为，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是这次行程中表现比较好的部分，因为其中触及自由主义与言论自由的议题，但遗憾的是都有如蜻蜓点水，“只是摸了一下老虎屁股而已，还不如连战讲的好”。

李凡说：“尤其昨天在香港讲的那些话，让人失望，中国人不需要李敖教我们怎么做事。你看他在北大讲了一点自由主义，马上就清华吹捧共产党，我们这个圈子没有人说他好。”

李敖在北大如何摸老虎屁股？

刘晓波

1949年后，昔日的“自由摇篮”的北大，被中共改造成今日的“自由坟墓”。

以骄狂著称的李敖走进了“自由坟墓”，想给坟墓吹进点儿活的气息，却要借一连串著名的死人和活人来支撑其话语权，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知名学者，毛泽东、周恩来等亡灵，都成为他传播言论自由的道具。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毛语录来戏说“言论自由”，进而来预言中共注定

灭亡；他用性开放的好处多多来论证言论开放的无害有益，用北洋军阀政府的宽容来凸现当今中共的不宽容；他用老北大的独立精神来抨击



刘晓波

(1955-2017)

新北大的“孬种”，用一系列外国政府屠杀民众的实例来暗示六四大屠杀，以此证明“所有的政府在这样的时候都是王八蛋”；整个演讲的点睛之笔，是他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中介，引出胡适的思想：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因为，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我以为，一位男学生的提问和李敖的回答，是整个演讲最出彩的地方。其精彩之处就在于：与其说是向李敖提问，不如说是质问坐在台上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

那位学生问：“……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闵维方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

李敖答：“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言论课堂呢，……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在此，我不能不向真正摸了老虎屁股的这位北大学子致意！也顺便向李敖的上述言论表达敬意。

但也必须看到，从凤凰卫视走上北大讲台的李敖，一心想扮演“自由斗士”，却已经丧失了昔日的锋芒。再联系他在清华鼓噪的独裁爱国主义，今日李敖非昔日李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撇开他本人的刁钻习性不谈，仅就他必须面对的压力而论，即便他不怕调戏中共，他也怕驳了老板刘长乐的面子。

曾几何时，面对蒋家威权统治，李敖具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他的一针见血的文风和不怕坐牢的勇气，堪称威权台湾的自由斗士。然而，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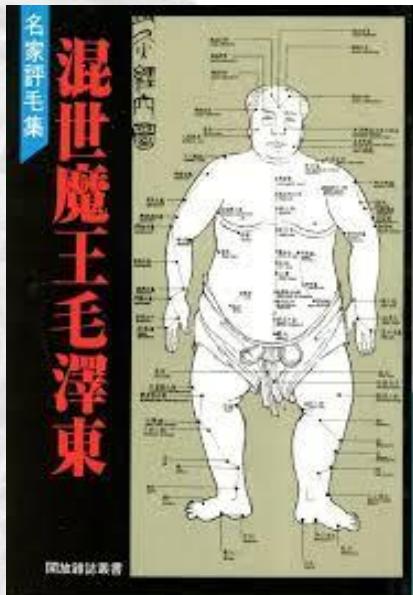
刘老师，原来这就是民主时代！

民主时代的到来，使李敖失去了对手，尽管骄狂依旧，叫骂更凶，但听众见怪不怪、言论市场萎缩。于是，李敖由自由斗士变成文化

刁民，他为反对而反对，他的叫骂不断变味，少了锐气而多了痞气，少了正气而多了邪气。多亏编外央视频道的凤凰卫视的“慧眼识金”，为李敖重新找到了贩卖叫骂的言论大市场。

李敖仍然敢恨敢骂，骂两蒋、骂国民党、骂连战、骂马英九，更骂台独，骂民进党、骂李登辉，骂陈水扁，顺便也骂美国、骂日本，但就是不骂中共，不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非但不骂，反而爆夸，从凤凰一直夸道北大。即便在北大戏说言论自由，他也大耍滑头，把自由国家的官民冲突等同于独裁国家的官民冲突，开出如何争自由的犬儒化药方自由的获得，一要巧妙地与独裁政府

周旋，二要与独裁政府合作。否则的话，还会遭到六四式的屠杀。他仍然高调赞美毛泽东和周恩来，顺便向胡锦涛献媚，拿出京片子



刘先生，李敖的文章怎么
和你的文章出现在同一本
书里？

的“自来熟”做派，称胡锦涛为“小老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

如此献媚于当今中共党魁，已经近于顽童向大家长撒娇了。

所以，他用外国政府开枪对付平民来暗示六四，那意思是说：我不赞成政府向民众开枪，也不赞成民众逼着政府开枪。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评论，看似公允，实则混淆了起码的是非。六四是是非善恶一目了然，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拿什么逼政府？难道和平表达政治异见也叫逼？事实上，六四屠杀绝非民众逼出来的，而是一贯敌视民意的中共政权的野蛮本性使然。特别是当独裁政权面对高涨的民意之时，暴力镇压便是这个残忍政权的必然选择。而按照李敖的逻辑，只要民众坚持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就构成政府开枪的条件。

李敖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还表示：超越六四和回归宪法。那么请问李敖：在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之前，台湾人能像李敖说得那样潇洒，超越蒋介石政府制造的“二·二八血案”吗？他李敖本人能超越十年大牢吗？而在依然独裁的大陆，六四亡灵还未得到公正

的祭奠，天安们母亲还无法公开悼念亲人，许多因六四而入狱的人士仍在大牢里煎熬，赵紫阳的亡灵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你李敖凭什么让大陆人超越六四？

李敖的北大演讲，再现了他用骂人来自我炫耀的小聪明，一开场就拿在同一场合演讲过的连战开涮，让连战在女厕所例露怯。可怜的连战，先是自愿充当胡锦涛的统

战工具，继而又被迫充当



刘同志，谁在用同胞的血换绿卡？你是聪明人，你最清楚了！

李敖的垫脚石，为了把连战踩在脚下，李敖只能“以怨报德”，不理会中共对他的万千优惠，而要安全地摸一下老虎屁股。

早已作古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台湾、在凤凰卫视，已经多次被李敖当作垫脚石，大陆行也两次当了李敖的垫脚石：“我在中学时候写文章批评一个教授，他后来写信，他很谦虚地给我回信，”

这段佳话已经成了李敖生命词典中的“典故”，动不动就拿出来用于自我炫耀。时隔仅一天的北大和清华的两场演讲，他就给听众讲了两次这个典故。不知道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场复旦演讲，是否还会引用这个典故。

必须承认，对比连战和李敖二人在同一讲台上的表演，连战是被中共操控的木偶，李敖是戏耍主人的戏子，戏子的嘻笑怒骂，当然比木偶的一本正经更讨观众的欢心。但李敖之所以敢摸老虎屁股，就在于他比连战更聪明：

1，他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就摸过两蒋的屁股，为此坐过十年大牢，并坐成了著名的“自由斗士”，他在大陆还多少具有自由斗士的人望，这是政客连战难以比拟的；

2，对中共现政权的两岸政策，他的把握远比连战准确：如果说，蒋介石政权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那么，中共现政权就是“武力统一无胆，民主统一无量”，而只能采取硬性的武吓和软性的统战来维持现状。而且，胡锦涛加大了对台统战的力度。

所以，骄狂成精的李敖，早就摸清了中共这只老虎的秉性：中共的恐怖统治，对大陆人是血口大张的“真老虎”，而对外人大都是收起牙齿的“纸老虎”。为了统战的需要，中共对台湾的各界名流，甚至要装成憨态可掬的“熊猫”。别说现在的连战、宋楚瑜和李敖等台湾名流，就是当年的“大战犯”李宗仁，只要肯于接受统战，毛泽东也会赐予“荣归故里”的待遇。何况，今天的中共政权，毛式霸气少了，邓式精明多了，对外政策的国家机会主义，已经到了“左右逢源”的圆滑程度。

李敖一到大陆，宣称他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不断叨念多少人劝他收敛锋芒，否则可能惹麻烦；他在机场表示，想以政治犯的身份去秦城看看，他在北大又说：“我讲这一点很多人提心吊胆，包括我在内，人家说，你到大陆来要不要看长城，我说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似乎他在北大摸了老虎的屁股，很可能遭受文字狱的惩罚。

但李敖心里清楚，自己是“外人”，而中共的老虎屁股，一贯是“外人摸得，自家人摸不得”。

比如，仅就这两年而言，大陆的网络异见作家张林、郑贻春和师涛等人摸了，分别被判入狱五年、七年、十年；维权人士李柏光和朱久虎等人摸了，分别遭到九个月、四个月的拘押，才得以取保候审。最近，郭飞雄摸了，再次被送进拘留所。

至于大陆的著名知识份子，他们没有统战对象的身份，自然享受不到李敖的特权，即便他们有心在北大讲台上摸老虎屁股，中共也决不会为他们提供机会。君不见，北大的焦国标在台下摸了，被砸了饭碗，远走美国；青年女教师卢雪松在讲台上讲林昭，至多是轻摸一下，却先遭停课、后遭取保候审的惩罚。

而台湾的李敖被赐予上北大讲台特权，所以，他摸老虎屁股，非但全身而退、无惊无险，反而温柔一摸，名利双收！

2005年9月26日于北京家中

(本文选自2005年9月26日《民主中国》)

且看李敖给老虎屁股盖遮羞布—— 评复旦演讲

清无

李敖的清华演讲夸老虎屁香（中共是老虎，自由被喻为它放的屁），中共对他虎啸道：“与我的政权相比，自由连个屁也不算。”李敖先生被吓破胆了，知道老虎忌讳谈屁，所以这次复旦演讲连一个“屁”字都不敢提了。给老虎屁股盖上了遮羞布，真正明白了，自由是中共的禁区，屁股是老虎的私处。

自由不能再提了，只好讲讲屁股的遮羞布，这块遮羞布就是所谓的务实。李敖首先把复旦的演讲定位为尼姑思凡，尼姑思凡的意思是慈悲成佛的理想太高了，还是想一想凡间的美男子、财物等更为现实。李敖好比是尼姑，自由主义好比是慈悲成佛的理想，太高了，不如务实赚钱搞经济。具体李敖是这样表白的：“我很务实的告诉你，得自己腰包里揣一点钱，才能够谈一切。我们讲的话很现

实，可是告诉大家，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看不起钱，看不起经济的力量。”“如果没有钱你干什么？培养一套安贫乐道的人生观，不要硬撑，否则的话，觉得你没有这些能力而想做这些事情是很危险的。”这两段话的解读就是中共搞活经济会使我们富有；中国解决温饱是最大的人权，国家穷，要安贫乐道，不要争取自由；如果非要争取自由是很危险的，机枪会突突的，坦克会轧薄饼的。自由、信仰是人的权利，当然选择放弃这个权利也是你的自由，但人的权利放弃了那还叫人吗？不过是一个行尸走肉罢了。请看法轮功是如何争取信仰自由的，中共剥夺法轮功的信仰自由，法轮功和平讲真相，坚持信仰，并不是在镇压下放弃信仰，放弃做人的权利。

李敖说：“我要宪法，不要自由。”不要自由，失去做人的权利，那就是——老虎的宠物狗。

李敖自称北大演讲的基调是金刚怒目，我看实际上只是碰了一下中共的自由；又自称清华演讲是菩萨低眉，我看他是献媚中共，吹捧了中共的自由；至于这次复旦演讲尼姑思凡，我看他是不敢触及中共所谓的自由了。以上看出李敖的三次演讲如同历经了三世轮回。

回，第一世轮回北大演讲，托生为一个卖身求钱的婊子，碰了一下老虎屁股来增加自由主义者的本钱；第二世轮回清华演讲，托生为一个割身伺主的太监，指鹿为马、指屁为香；第三世轮回复旦演讲，托生为一只失去自由的宠物狗，务实，有吃有喝，活着就好。李敖说：“我已经 70 开外了，我已经垂垂老去。”来世你还能托生个什么玩意儿？望你好自为之。



别只说郑南榕「台独烈士」！老党外： 只会获半数国人尊敬

简立欣

昨天（7日）是民主斗士郑南榕逝世35周年纪念日，总统蔡英文参加追思纪念会，准总统赖清德也重申要捍卫100%言论自由。不过党外时期与郑南榕一起编杂志、且从不避讳自身统派色彩的好友石文杰，却撰文指出郑南榕是自由主义斗士，呼吁别再把郑矮化为台独烈士，「如此只能获得一半国人的尊敬与肯定。」

石文杰表示，郑南榕虽主张台



“争取言论自由，
维护人权尊严。”

湾人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但也尊重「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自由。郑创办的《自由时代》杂志，邀请了主张台湾独立的陈水扁当社长，也邀请了主张两岸统一的李敖担任总监，郑南榕自己则担任总编辑，还请独派的胡慧玲担任杂志执行编辑，石文杰则是每周截稿日自台中北上帮忙，由郑南榕支付差旅费。《自由时代》固然刊登许世楷等台独主张文字，也刊登江南、李敖、陆铿等统派文字。

石文杰表示，当时他受郑南榕之邀担任《自由时代》系列丛书执行编辑，这套丛书的查禁率是「100%」，其中有主张台湾独立书刊，也有主张两岸统一的著作。郑南榕认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宜纳入丛书系列，因此该丛书统独各半，平分秋色。

郑南榕还曾资助石文杰两次出国，一次到星、港，一次到日本、美国寻找书刊，以便出版。出国前石文杰告诉郑南榕，自己持兼容并蓄精神，去到星、港、美、日，可能左右统独各方人马都会拜会相见，只听郑南榕说了一句话：「Why not？」

石文杰说，郑南榕是台大哲学系毕业，这是一个标榜继承北京大学自由开放精神的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持兼容并蓄、有容

乃大的精神办学，北大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前卫教授，也有刘师培、辜鸿铭等保守但国学底子深厚的教授。郑南榕正继承了这种精神，他主张并争取 100% 言论自由，因为他是殷海光的学生，般是自由主义的倡议者，自由主义的真谛是尊重异己，包容异见：「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石文杰说，他与郑南榕情同兄弟，后来郑南榕为抗议言论自由遭侵犯，不惜自焚以殉道，求仁而得仁，石文杰难过、不忍与不舍，但对郑南榕只有更多尊敬和怀思，因此在郑南榕逝世 35 周年的时刻，他要提醒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别再把郑南榕矮化为台独烈士，因为如此只能获得一半国人的尊敬与肯定，同时也是严重消费和曲解郑南榕争取 100% 言论自由的精神，愧对郑南榕。

(本文选自 2024 年 4 月 8 日《梅花新闻网》)

编辑室报告

辰之

自去年三月至今，集刊共刊出二卷十二期，虽然每期发布时间都比较随性，却也可视为每月一刊。

这一年，是我一生中较为折腾的一年，倒不是因俗务太多导致的折腾，而是我自己为把一些计划和想法落实而折腾。回顾一下，这一两年也算收获颇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学到了很多新内容。不过，最大的收获，还是自己走上了一条行动派的道路，我不再是停留于纸面、口头和脑海的，我是活生生的，能切实影响到几个人的。也就是说，我似乎体悟到了自己的某种价值所在。也许在某一天，我也可以学学李敖和郑南榕式的“行动思想家”，虽然现在谈不上什么思想，但先行动起来总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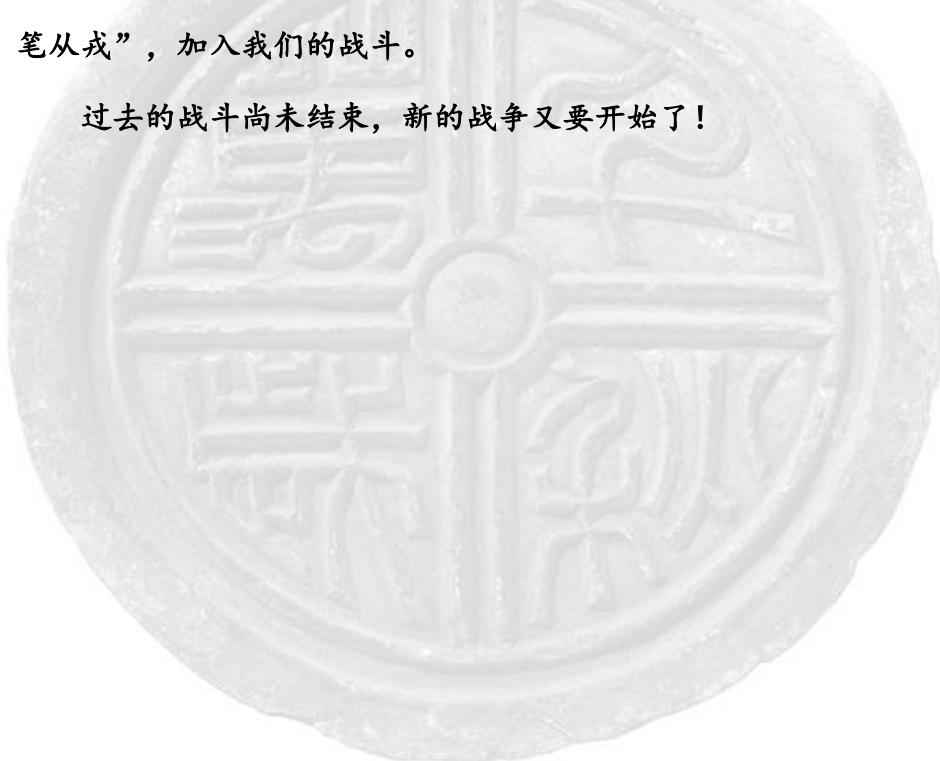
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的，绝不停止，亦不回头。

集刊前两卷十二期现已全部刊出，以后或可以六期为一卷的形式单独刊出。下期集刊，将进行改版，主要是针对配图、按语、介

绍、评价等方面的增添和调整，或将模仿李教党外时期的刊物对具体的文字排版进行调整，诸如标题字体、引文等等，敬请期待。

同时，也希望大家在垂阅集刊之余，或有所欲言，不妨向本刊投稿，符合要求者必然采用。此言论自由之阵地，随时期待大家“握笔从戎”，加入我们的战斗。

过去的战斗尚未结束，新的战争又要开始了！



休戚・能否・與共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 第十二輯



編著者 辰之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文星書店有限公司

發行人 李敖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 7080001 FAX 7023411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董事長 蘇榮泉

監管組 辰之 督印組 辰之 校訂組 海心

編輯組 辰之 資訊組 辰之 美術組 辰之

訂戶組 海心 發行組 海心

代理發行經銷 小書畫報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 7080001 FAX 7023411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版權 保有一切版權

臺灣境外
總負責人 劉會雲 Martha Liu

P.O. 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版次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版

定 價